



言思录

第四期

2015 年 4 月 1 日

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沙龙部、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博士沙龙工作坊 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

上外博士沙龙
嘉宾寄语

1 版

历史地理与未来

2-5 版

语言之为交通设施

6-8 版

主题书评——

《批评官员的尺度》

9-11 版

访谈实录——

访佐治亚大学

Jace Weaver 教授、

上外陈琦老师

12-14 版

上外博士沙龙

主讲人推荐

书目选摘

上外博士沙龙

主讲人

最新学术成果

目录选摘

15 版

顾问:汪小玲、韩殿秀

本期特约顾问:赵弢

指导:杨雪莲、夏卡莉、丁娟、

张艳、盛攀峰

策划:朱硕

主编:陈晓

采编:徐宜修、杨瑞雪、余桂

茗、肖志魁、李仪鲜、孙敏、杨

琼、李娟娟、张梦瑶

美编:陈晓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邮编:200083

起源于一个想法

开始于一种信念

发展于一种坚持

致力于一种精神

给学术以尊严

上外博士沙龙嘉宾寄语

祝学术创新之路越走越远。

——张和龙(2014 年 3 月 18 日第 126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学无止境。

——吴兆路(2014 年 4 月 1 日第 128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越学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同上外的青年朋友共勉。

——徐盛恒(2014 年 4 月 13 日第 130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祝讲座启迪新智,促进交流。

——涂怡超(2014 年 4 月 15 日第 131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愿诗歌让我们生活更美好。

——王欣(2014 年 4 月 29 日第 133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姚大力(2014 年 5 月 6 日第 134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葛剑雄(2014 年 5 月 8 日第 135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博士沙龙乐于学乐于思。

——陈嘉映(2014 年 5 月 13 日第 136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科学走进人文。

——周昌乐(2014 年 5 月 17 日第 138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道德文章,坚持两条:Honesty and Originality。

——朱永生(2014 年 5 月 20 日第 139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功不唐捐。

——易龙(2014 年 5 月 27 日第 141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在上外了解世界,从上外走向世界。

——程映虹(2014 年 6 月 24 日第 148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历史地理与未来

主讲人介绍：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人文分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很多人都以为历史地理是历史系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不是。但是,历史地理的确是国家,特别是博士这个系列里面,在历史学里面。包括二级学科分出来就有一个是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里面,在人文地理这个类里面,也有历史地理。但是相对而言,在国内,多数单位的历史地理这个点是放在历史系,或者从历史系分出来的,比如复旦、陕西师大、武汉大学、西南大学、暨南大学等。但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就是一直在地理系。北京大学最早有地理地质系,后来地理地质分家,历史地理还是被分在地理系,现在叫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它现在变成社会环境,但还是属于地理系。是什么原因让它侧重点不同,我后面会讲。

为什么它(历史地理)跟历史关系那么密切?主要原因如下:我们今天如果要了解当代的或者比较近代的地理,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实地考察,用科学的仪器观察测量。比如要了解上海这两年的气候情况,就要准备温度计、气压仪计、量筒、风向仪这些仪器,把速度等指标记录下来,就可以研究近年气候了。比如要研究喜马拉雅山这一带的地理状况,就要到那里去,看卫星照片、遥感照片,或到那里考察。要了解那里植被的分布,就要亲自

去看,了解有什么树种,有什么动物。这些都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解决。

但是如果要是研究一千年前上海的气候,或者两百年前上海的气候,要靠什么呢?上海有全国保持气候观察记录最早最全的地方,就是徐家汇的天文台,自 1871 年开始记录。但是记录也只有一百多年,还不到两百年。那如何研究两百年前甚至两千年前的气候呢?此时主要依靠前人的记录,也就是依靠史料。一涉及到史料,就必须掌握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历史人口,要知道唐朝时中国有多少人,难道还去找当时的人做调查吗?或者去现场考察,也考察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唐朝古建筑如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等现在都已经是废墟了。那如何获知当地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人口数目呢?现在无非就是靠唐朝留下的史料:唐朝留下的户口数字,唐诗里面所描述的人口、地理景观。

因此,一般而言,除了个别现象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而获得地理信息,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地理研究都离不开史料,都必须使用前人已经有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记载。都必须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有限度的、可能的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这就跟当代地理不同。如果研究当代地理,也许不必看得懂古文,甚至可以不用史料,不过能用当然更好。你可以在实验室

里,使用电脑或利用仪器观察,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要是研究历史地理的话,必须要懂得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必须懂得如何在史料之中找出必要的条件;至少必须懂得判断根据现有的史料能否研究现有课题。否则,你要么会束手无策,要么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比如这些年,很多人因为发现当前地理对土地的利用的研究很热门,于是就去研究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他们认为研究很方便。因为限制了亩数,很多都精确到个数,再在电脑上一算,是很方便的。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数字并不是真的数,就像今天各地报上的很多经济指标数都是假的,甚至跟实际差很远。现在报告最近一次土地普查,我们一直叫器要守住 18 亿亩的土地红线,最近土地普查发现全部多出 2 亿亩了。这是怎么多出来的呢?部分原因是现在测量仪器精确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东西,如果不用仪器测量,都能隐瞒的,地方上也会隐瞒。比如上海,每年东海的泥沙冲出来的土地,经常上报,地方上都会留点余地。那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就要求你懂得历史。比如唐朝的土地数字跟实际数字之间有什么关系,明朝的户口数跟实际人口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你要知道,要懂得。

如果你认为利用电脑上的资料,利用扫描的图书就可以做学问,那你就

上当了。比如把上海明朝的地方志拿来(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到崇祯年间,上海的县和松江府的大多数县,总人口数是不断下降的。这就很奇怪,人口数怎么下降了呢?而且,不但总人口下降,每一户的人均人口也是不断下降的。从明朝初年每一户大概五到六个人,下降到明朝末年每一户两到三个人,甚至是一到两个人。这可能吗?有些没有受过历史教育的人就会想到很多:当地单身率很高或者明朝人口进入某个时期等原因。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明朝初年朱元璋时期,户口查的很严。朱元璋甚至留下一道白话的诏书:我的大军如今不打仗了,都给我去比查户口。查的真切的有赏,查的不真的,砍了你的头。老百姓隐瞒的,送去充军。人口数下降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一来,人口数就比较正确了。但是朱元璋以后,大家又开始隐瞒了。皇帝跟大臣觉得辛辛苦苦查户口干什么呢?查户口的目的无非是要收税。那么干脆把各地的税务份额固定下来,每次再查,只准增加,不准减少就行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明朝初年,所有男女老少都要调查,这是能找到证据的。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不调查了。一个县里面本来有一万个名额,每个名额交一千两银子,可以知道应该收多少(税)。那么下一次来,就要加 5%,或者是增额不增价。这样一来,大家只要编一个数字,只要收到的税不少就行了。实际去调查干什么呢?用不到的。所以到后来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后来统计的已经不是人,而是赋税指标。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去看那些数字,感觉很精确,每一户多少。这是完全假的,没用的。

所以,你看历史地理学,像侯仁之先生,就非常典型。侯先生跟谭先生(谭其骧)一起当选为 1980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去年刚刚去世,享年 102 岁。他本科的时候就在燕京大学念的历史系,硕士也在燕京大学学历史。然后到英国,到利物浦大学,师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教授大卫,学的是地理,拿的是理学博士学位。他回国以后在北大,做地理地质系的主任。他为什么(能当这个主任)呢?他是学地理的,但是在学地理以前已经打好了非常好的历史基础。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学科,我的老师谭先生也是院士,侯先生也是院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地质部,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那么其他历史系有没有可能有院士呢?中国科学院 1980 年恢复的时候,并没有恢复人文学科。所以有人很觉得很奇怪,说你的老师学历史,怎么是院士呢?我说你不要弄错了,我们研究的是地理,所以才有可能啊。那么,这个学科的性质明白了,它跟未来为什么特别有关系呢?下面我就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刚才讲到,我们现在现代的地理积累下来许多观测的数据,科学家把它叫做"器测时代",也就是仪器测量时代。大多数器测时代或者器测年代都

不长的。那气候有气温的纪录、雨量的记录、气压的记录。这些年代到现在全世界有记录的最早的也不超过 180 年。那么还有,要观测的话,就必须有延续性。你说 180 年测量一次,然后到 160 年再测,这是不行的。那么每天不缺,基本上这么观测下来的,中国最早的点就是上海徐家汇天文台。那么世界上总共有这样比较长的年代的点只有 50 个。其中 90%,也就是 45 个都集中在西欧。很多地方是空白的。比如中国很多城市是到 1958 年才开始建立气象站,才开始记录(观测)数字的。所以前些年有一年,黑龙江的冬天特别冷,有的报纸就说"黑龙江出现有史以来最低温"。(我们)马上就要纠正他,为什么?你怎么就"有史"呢?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就改成"有气候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温",这是对的。比如上海,前年夏天出现的高温,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这个历史记录是指什么呢?也就是 1871 年以来是最高。但是 1871 年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不敢说。那么也正因为这样,我早在 20 年前就挑战了现在科学家普遍认为的"全球变暖"的观点。为什么呢?很多气候的变迁周期非常长。比如一般的研究古气候的人认为,全球的气候有一个由冷变暖,由暖变冷的这样一个周期,大概是 1500 年。有人称之为罗马周期。因为他研究古罗马时代的气候,这样研究下来。那么中国也是这样。

比如中国(气候研究者)一般认为,商朝跟周朝初年,气温比较高,然后慢慢慢慢将下来,慢慢变冷。以后又高起来,到唐朝以后又冷下来。然后又高又低,这样经过好多周期了。问题是如果是 1500 年一个周期,而现在的人类就掌握了不到两百年的气候数据,就算这两百年气温都在上升的,何况还不是。一般认为以往一百年中间气温是明显在上升,那么你怎么知道下面这一百年,它一定是继续上升的呢?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到最高的地方又下来呢?因为两百年的话,要观察 1500 年的周期,只能是其中一半。观察了 3000 年,两个周期,才可以有点发言权。比如我们现在对太阳黑子的变化对气温的影响有充分的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太阳黑子的变化是 11 年一个周期,观察 110 年的话就有 10 个周期了。那么我就看最高有个头,最低有个头,那么我就说话有底气了。那么现在凭什么证明气温在变暖呢?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呢?根据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以往气温最高的时候比现在高得多,同样,最低的时候又比现在冷得多。那么大家说,既然没有器测时代,你怎么去证实呢?这就是历史地理的独特之处。因为历史地理不一定是根据气温记录是多少度来判断,还可以根据很多现象来判断。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本身学的就是气象,但是他历史的底子也不错,加上他长期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我的老师就是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浙大有个

● 沙龙拾萃 ●

很好的传统,把历史、地理放在一起。好多杰出的地理学家都是从浙江大学出来的。竺可桢也是。他还请了人家帮他搜集资料。他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国七千年来的气候变迁》。他凭什么研究这七千年呢?这就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考古阶段,利用了很多考古的机会。这个很管用。比如最著名的例子,甲骨文里面,有多次记载商王在他的王都附近打猎,打什么?象,elephant。这王都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天的河南安阳这一带。这些甲骨文现在还在呢。所以,中原一片说打到七头象,都是野象,不是人工饲养的。这个野象能够在今天黄河以北,河南安阳这一带过冬,这说明什么?今天只能在西双版纳(看见野象)了。上海动物园那些象要过冬,必须在屋子里放暖气。有一年英国的马戏团到上海演出,有两头小象,不知道上海冬天的厉害,结果有一头就冻死了。当然,对于动物,还要考虑驯化的作用。就是经过驯化,它们要比正常的稍微耐寒一点。但这个驯化的幅度不可能那么大。何况找到的还不止一个证据。比如,在河南这一带还发现不少商朝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把它们命名"象樽",器皿上面就是一头象。还有人认为,河南古称"豫",就是拿矛刺象。

他(竺可桢)分的第二个阶段,是物候阶段,动物的"物",气候的"候"。"物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植物、动物它们的生活的节点,比如开花、结子、播种或者候鸟回归等这些节点,来反映出气候的情况。比如说梅花,在今天,在这里是几月几号开的。那么如果去查到一首唐诗,说到上海来看到梅花初开,几月几号。一对照,一般来说,如果(唐诗描述的)开的时间比今天早,说明什么?气候比今天暖。开的比今天晚,那么一般而言(气候比今天冷)。而且,通过它相差几天,还可以算出来气温大概差多少。比如宋朝某年某月初雪,就是初次下雪,那你再对比现在什么时候初次下雪,或者现在不下雪,那肯定是现在气候变暖了。初冰——有一首诗讲的元朝人在北京,那时是燕京,看到燕子,第一次燕子出现比今天差多少。通过花、动物、植物,还有古代很多农书,比如《齐民要术》、《王祯农书》。比如农书里讲到山东什么时候种麦子,今天什么时候种麦子,你可以比较。所以通过物候的比较,也可以(了解)中间这一段时间这个气候。

第三个阶段,竺可桢称之为方志阶段。什么叫方志阶段呢?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地方上,到了今天我们不是也要修新的方志吗?一个县有县志、一个府有府志、一个省有省志,或者叫通志、全国有一统志。那么这种方志里面有很多关于当地的这种物候、动植物分布、灾害(的记录),甚至有直接描述气候的这种记载。而且它的面很广,几乎



各县都有。而且资料往往都是比较延续的。比如清朝已经规定地方志、县志 60 年修一次。今天,我们全国修方志第一轮已经结束,第二轮有的都已经修第二次了。这个方志,现在我们找到的有八千多部。其中属于宋朝元朝的不到一百部,主要是属于明朝、清朝,还有一些民国的。那么方志阶段呢,这个资料就多了,就可以做比较多的分析了。那这也可以分析气候的情况,而且它的面呢就比较广了。

最后,当然是器测阶段了,利用仪器来测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中国,一般最多像上海的一百多年,好多地方只有几十年。那么通过这么样研究下来以后,他(竺可桢)的结论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气温的波动。最热像商朝,距今 3000 多年,4000 多年前的时候,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四至二度左右。这是相当厉害的。这比我们现在全球变暖最高能达到的高得多。那么最冷的呢?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南宋的时候,上海周围这一带天气很冷。像苏州这一带,船出去时往往前面要坐一个人,手里拿一把铁锤。干嘛?破冰。否则(船)不能开的。那现在有这个情况吗?不要说河里,河边上有多少结冰的呢?我们小时候也曾经看见河里结冰,当时大人说:不许踩上去哦,不然会掉下去的。但是宋朝的时候太湖全部结了冰,上面可以走人,可以行车骑马,要比现在冷得多。所以这么一看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尽管出现全球变暖,(气温)是在升高,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是不科学的。现在都讲平均气温,我曾经问过(专家)怎么算。海洋里算了没有?弄了半天,最后又有了。以前怎么算不出来呢?地球上绝大部分都是海洋,测量海水水温的变化,到底有多少观测点?怎么算?

比如今年美国,上个月我在那里的时候,本来波士顿、芝加哥的气温已经到68 或者 70 华氏度了,突然之间就下雪了。那北美今天先变冷的。你把北美的气温先测好了,然后怎么

评价?你怎么能说今年整个地球一定变暖呢?如果一定要说全球,那应该算出一个总的气温是多少。这样才可以说是变暖还是变冷。但问题是地球上的温度,所有能量,一个来自太阳辐射,太阳辐射的变化很微小。还有一个来自地球本身的地热,地热的释放也是基本正常的。实际上往往是这样,今年变冷的话,人就会感觉不适,比如今年北美就是冷冷的。那国内呢,一般感觉也是不同的,有时候突然热。但是最近几次,像新疆等北方地区今年还在下雪。那如果你留下了这些记载的话,如果不是根据前面的分析,那这个结论(全球变暖)到底对不对呢?

到现在为止,地球上的观测点还是很不平衡的,有好多点并没有好好观察。现在好多人都说冰川在融化,这是事实,但是有些冰川也在长啊。又比如说沙漠化,有些地方土地变沙漠。但是反过来,有些地方,比如有一次,是前几年,智利从来都是沙漠,突然下了雨,过一段时间就是鲜花盛开,草丛茂盛。也有这种情况的。前些年一直说蓝天上空臭氧的空洞越来越大,这两年还讲不讲啊?不讲了,其实这两年已经比较正常了。比如现在都说北极航道已经开通了,我前些年到北极去,是这样。但是北极好多地方还是冰冻的,西北航道并不在北极点上。我们去的时候,北极点始终还是两米多厚的冰。现在我们说气候变暖,格陵兰岛历史上曾经变暖过,所以现在才会迁过去。所以这么一个短的周期,你就肯定气候变暖了,我到现在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就算变暖了,是不是就是人类的事情?我们大多数气象学家的观点,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认为主要因素是自然本身。明朝的时候,人口跟现在不能比的,一点工业化都没有,气候那么热,难道也是因为二氧化碳吗?没办法解释的。而且不要以为人类现在工业化了就很厉害。跟自然比起来,相当渺小的。比如有一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就这一年整个北半球冬天的气温就下降。为什么呢?喷出的尘埃散布在空中,就挡住了一部分的太阳

光。你看,一座火山爆发,就可以使北半球冬天气温下降。前几年冰岛火山爆发,也影响到局部地方,那还只有一个地方火山爆发。通古斯大爆炸,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一个岩石下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还好只发生在西伯利亚。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说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就告诉我们,不是说将来不可以有变化,但是不要轻易的就肯定它。很多地方你要用历史的,长时段的变化去考查,这样的结论才是比较科学的。当然,我也不反对现在这种做法。因为对可能发生的变化,警惕点总是好的。另外呢,比如说,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点,少消耗点资源,这个总是对人类有好处的。但是我反对把这个事情政治化。现在包括西方的一些主流科学家,你不承认这个,就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把这个假设的前提放好,甚至出过很多洋相。比如某年国际气候变化联合国的机构公布,说照现在的发展,喜马拉雅的那些冰川经过多少年就会融化。怎么可能呢?后来说,点数要用小数点。怎么这样呢,开什么玩笑,基本的常识在哪儿?

所以大家注意,现在有一部分科学研究已经政治化了,利益化了。比如说,关于环保,新能源等,发达国家就拿它做为对付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武器。很多对气候的预期,道理讲了一大套,凭经验说北美的很冷,事后又讲什么东西都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那么我就问他们,你们事先为什么不说清楚呢。很多现象,事后都说是全球变暖,引起的气温上升。既然假设,为什么不去精确的预测呢。退一步讲,就算是全球在变暖,它也不是一条直线,它中间也是有起伏的。即使是全球整个都在变暖,也不等于证明,你这个地方就在变暖的范围,甚至会变冷,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 1997 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就提出我们对未来的变化,不能无忧,不必过虑。何况像中国这样的一个跨的维度很多的国家,不必过于担心,

我们又不是太平洋上的小岛,水涨了就没有地方逃了。如果广东变成沙漠了,黑龙江就变成乐园了。你看,北方这几年雨水多了,马上就好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科院预测新疆未来会出现一段湿润的时期,未来降水量会增加。所以他们就提出进行新楼兰计划,就是以前不能开发的地方,现在开发,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现在这些预测,大多是准的,这几年新疆每年冬天不是闹雪灾,就是闹洪水,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但是长时间的观察,新疆解放以后,这么 60 多年,基本地表径流量 281 立方,基本差不多。这几年降水是在增加的。所以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随便的,真正的研究,就要这么细致。所以南方雪灾的前一年,我在《南方都市报》接连发表了几篇千字文,讲到我们不要总是以为会出现暖冬,很可能出现短时间的寒冬,甚至雪灾。他们问怎么第二年就出现了,我说这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这是基于对历史地理的一种认识。

所以这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史料,尽管不是最早的——这一点我要趁机纠正大家的偏见,我们大家老是说,中国历史悠久,其实中国历史在世界主要文明中间,是比较短的,我们现在就是五千年文明。真的五千年吗?我们的甲骨文距今只有3000 多年,在这之前没有发现过。埃及的文字呢?美索不达米亚那里的文字呢?世界最早的文字语言都在那里。一般的泥板文字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到一万年,埃及的文字最少有 6000 年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字理事是比较短的,我们的历史也不长。但是有一点,中国(历史)从甲骨文开始是延续的,我们的甲骨文现在基本都破解了。而且从甲骨文开始变化,接下来钟鼎文、金文,然后到篆书,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历史基本没有中断。但是埃及呢?当时埃及法老的后代到哪里去了。现在埃及人成了阿拉伯人的后代。今天,像意大利人是不是就是罗马人的后代,他们变了好多。他们早期的历史很现在的历史是断的。那么,中国呢,一方面文字是延续的,而且从秦朝开始,至少已经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一直到清朝扩大到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这两千多年期,始终有一块至少可以覆盖四百万平方公里,有大量的史料。这比一个岛上保留几千年的文件是不能和我们比的,而且在这几百万平方公里里面有平原,有沙漠,有高山,各种地貌都有。那么,这一套历史地理的记录,包括它的气候,它的环境,它提供出来的样本,对人类的贡献是没有别人可以找出来的。比如前几年,我们和哈佛大学合作"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做了以后,大家问我们的水平怎么样,我说我们的水平是世界最高水平。不是我吹牛,不

● 沙龙拾萃 ●

信你们自己用英文上网查一查人家怎么评价。我们用软件是美国的商用软件,它不断更新,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用的资料,我们可以做到两千多年,我们从秦始皇时候开始做起,欧洲和北美他们做历史地图,他们已经做到两百年,目标是三百年,而我们的目标是做三千年。既然技术大家是一样的,我们做的内容他们没办法做到。好处是,没有什么语言障碍的,一看就知道的。所以当初哈佛大学的副校长,跑到复旦大学来,跟我们校长讲,这个计划最有水平就是这个项目,还有他们的基因。这两个没有什么争议。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光荣,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光荣,中国历史的光荣。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率的承认,我们的历史不是最悠久的,但我们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做出来这个。但是不要以为全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出来,青藏高原你可以做吗?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史料很有限,我们就做不出来。但是中原这块地方,我们是可以做出来的。那么这是自然的变化。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讲那么多)。若讲到自然,黄河怎么变的?上海附近海岸线怎么变的?上海为什么叫上海?为什么不叫下海?上海老师讲上海六千年的历史,是指今天上海市它的行政的管辖范围,不是上海这个城市。因为上海的东部明显的是在一万两千年的时间里,陆续沉落,怎么会有六千年。但是上海的西部,早在七千年前就沉落了,所以它可能有六千年的文化,是这么解释的。比如说我们坐的这一带,在两千年前绝对是一片汪洋,而这个过程也是可以通过历史地理的方法进行研究。当然,历史地理不是唯一的。有的时候,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可以通过其他(方法研究)。比如你这个地层,你可以钻一个井,打下去,把它的泥心拿出来,分析它的时间,看看这些地方有浮游动物的遗体,证明这个地方哪一段时间是海,可以做。历史地理做,有它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当时七十年代,上海要建设金山石化总厂,那么金山石化总厂是建在海滩上的。这个海滩是不稳定的,因为上海的周围既有不断长出来的地方,也有不断坍塌的地方,就在那个金山石化总厂附近有一座大金山小金山,今天已经在海洋里面,离开海岸一个十公里,一个五公里。但是宋朝人记载,这两座山都是在大陆上面。有人到那里喝茶,那里有泉水,还有诗留下来。如果建在像金山这种地方,过几年就冲掉了,那不是白建吗?如果你要利用这块土地,比如建设浦东机场的那个跑道,你就要查清楚,它要处在不断淤建的地方,你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建港口呢?要建在在不断冲刷的地方。如果也建在淤建的地方,那完了,这个港口今天可以运一万吨,明年 500 吨,就不行了。你到欧洲去,有的港口,已经成为了纪念碑,

因为距离海岸线老远了。那么像这种呢,当初我的老师,到那里去,他们叫他研究,分两路。一路是市里请他们钻井,证明下面的地层结构;一路呢,从历史地理方面论证。最后研究的结论告诉他,非常安全。不仅安全,还在处在不断涨的过程中间。所以现在金山的一期,二期,三期不再占用新的土地,都在利用这个。当初建设浦东一号跑道的时候,也是一个学生吧,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吉余院士的团队,是研究海岸河口的。他们建议这条跑道还可以往外延,这样最少节约 10 亿以上。为什么?这充分利用这地势。你看,现在都开始建设五号跑道了。不需要用新的土地,都朝着海的方向去,因为有了新的土地不断长出来。

这是自然方面的,那么人文方面,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也就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我们古代,从秦始皇开始,那么郡县制推广到全国,所以那个时候中央,朝廷下来就是郡,然后下面就是县,但是以后呢,领土扩大了,单位多了。到汉朝的时候已经有 100 多个单位了。在当时没有基建交通的情况下,比如说首都长安,西安,它统治的最南面在今天越南的胡志明市附近;西边,最远统治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东边到韩国首尔南面;北面到阴山。这样的地方,从郡再管县,中央管不过来。慢慢的从二级变成了三级,在郡上面设一个州。唐朝宋朝,上面变成道,或者路。到明朝、清朝稳定下来。上面是中央政府,下面是省(行省的简称),下面再是府,府下面是县。这样四级。到了民国的時候,把中间的一级给废掉了,就是中央政府,下面到省,再到县。但是到了蒋介石要围剿红军的时候,他发现不便了,他的指挥中心设在南昌,江西省省政府要管下面的县,调动下面的县出人出力包围红军。在瑞金周围,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有的县距离南昌比较近,有的县距离南昌比较远。但是都要通过南昌指挥,行动不便。所以当时有人创造了新的花样,在若干县里面设一个区,派行政督察专员,作为省政府省长的代表,比如当时,西面的 8 个县,派一个督查专员,北面 7 个县,也派一个督查专员,南面几个县,也派一个督查专员。他们代表省长,自己就可以协调,不必要什么事情都要省里去管。后来发现这个办法很好,就推广到全国。这就是我们解放初专区、地区的来历。比如说,蒋经国是赣南督察专员,他负责管理好几个县。但他这个督查专员不是一级政府,他是省长代表。机构比较简单,这个制度解放以后都有地位。比如解放南京,南京在江苏下面。我们上海的郊区叫做松江专区,它有十个县,专员是由省长派下来的,地委书记是省委派下来的,地委跟行属自己没有很多部,就分几个口。比如农林口管农林,他们都不是一级权利机构,不开人大,也不开政协。

但是这个制度,到改革开放以后,变了。开始想出来,县要变成市,也就是县级市。现在好多地方全是市了,到底这个市,是城市还是乡村就不清楚了。城市化很简单,就把县变成市,县

长变成市长,农民变成了市民。第二个,想出来要市管县,带动县。然后呢,最后要地改市。所以全国现在,除了新疆西藏,还是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其他全部统统变市了。这样以来宪法要改了,但是也没有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的政区,有省,有县,加了一个省辖市。宪法用了一句模糊的话说,比较大的市可以开人大,就是承认它是一级政府。那么什么叫做比较大的市,结果全国除了新疆,西藏,所有的其他市都变成了比较大的市,全部可以开人大,开政协,形成新的一级政府。所以我现在问同学,你们是那里人呀。很多人都不和我说,我是来自哪个县,而是说我是来自哪个市。问他那里,他说徐州人,徐州那里呀?东海,平县。其实中国历来是有县的,但是现在县都被上面的地级市给管掉了。现在很多县,很多市都变成区了。比如吴江,现在叫吴中区。南京本来管不少市,现在也变成区,甚至小的地方也叫区。这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原来这个市,哪怕是县变成市了,归上面大的地级市管,理论上还是归给省政府,是交给你上面的市代管。既然是代管,那么它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改成区以后就没有了自主权,城市的区就是城市化了。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土地都归市里有。最早是由广州想出来的,它管辖的地方比较小,那怎么办,就把它管的番禺市、花都市、从化市、增城市这些县级市统统改成区,那么这点土地都归它了。所以现在看报纸觉得很奇怪,实行省管县,其实县本来就是被省管辖的。还实行县干什么?现在把剩下的县都提高到相当于地级市的级别。本来县长最高就是正处级别,现在一些资深县长,副厅级别。县委书记怎么变副厅级呢?县委书记,兼上面大的市的常委,就是副厅级了。省里面呢,比如说做市委书记,是政厅级,兼江苏省委常委,兼苏州市委,变成副部级,副省级。这个变化的过程,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块,就是政区的变化,就知道了。像周振鹤教授,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知道以后,那么今天中国未来的政区会有什么改革,会有什么问题。你就比较清楚了,至少你不会重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弊病和错误。现在没用,他明知道错了还是要做。但是的确有些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下面我举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习主席提出来要开辟新的丝绸之路,要建设丝路经济带。

当时丝绸之路开辟的动力是来自中亚、西亚和欧洲,是他们需要中国的丝绸,所以才不顾千辛万苦,哪怕死掉,冒着生命的风险,也要获得中国的丝绸。也只有丝绸才适合这么千里万里的运输,那为什么不搞几块砖头呢?不搞几块铁呢?这个都不行的了,陶瓷也不行,运费太高。那么丝绸呢?比如罗马帝国的贵族把丝绸看得比黄金还值钱。据说罗

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就是黄金都换了丝绸了。那么丝绸,一个骆驼,一匹马,或者几个人就可以长途运输,丝绸也不会坏。另外,这个保值,哪怕碰到灾难,过几年丝绸还是值钱。这个动力不是来自中国内部,所以中国不当回事的。丝绸之路的名字是谁定的?中国古籍上没有丝绸之路这几个字,也不知道有一条丝绸之路,这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国来考察,到西部,到中亚,考察了四年多。最后他回到欧洲,在大概 1877 年,第一次提出了历史上存在一条丝绸之路。这不是中国人开辟出来的。就算是中国人开辟的,中国人也不知道也不明白它的价值,也缺少这种自觉性,否则怎么自己不启用这个名字呢,要人家来启用。至于海上丝绸之路,那是最近一段时间,人家(认为)既然陆上有,海上也有啊。他们不晓得海上就不叫丝绸之路,海上已经是茶叶、陶瓷都可以运了,不是说只运丝绸的了,这就没什么特色,就是海运了。其实海运主要是阿拉伯人开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开的,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丝绸之路,因为它特殊的情况,你看交通线这么长,像个链条一样,只要一个环节断了,这条路就断了,经常断。从丝绸之路的历史来看,是通的时候少,断的时候多。实际上,它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已经存在了,但是因为中国自己没有这个积极性,主要是外国人。最多是今天新疆这一带,两千年以前,好多白人在这里工作。不是汉人迁过来,是白人迁过来。迁过来以后,他们在这里把东西买到家乡去,那么张骞通西域就把这条路开通了,他把匈奴人赶到北面,这条路就比较畅通了。但是即使畅通,也没有什么中国人跑到那里去。跑去干什么呢?当时有一些张骞的副手,他们为了挣钱,冒充国家的使者到那里去做买卖,后来都给禁止了,所以在原则上汉朝、唐朝都是不许随便出关的,出关要有文件的,要有护照的,唐僧当年就是没有护照,偷渡出去的。他被抓了以后,要不是边防的那个警官也是信佛的,把他放了出去的话,他是出不去的,历史上就不知道有唐僧了。这个很简单,因为中国人认为自己在天下之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最文明发达的就是我们这里了,其他都是蛮夷,是 barbarian.

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对外的这种愿望呢?(中国人认为)开它干什么呢?我自己好好的田还没有种完,我去开拓干什么?每次开疆拓土皇帝都要被骂成暴君。汉武帝开疆拓土是想获得天马,汗血马,然后趁机给自己的小舅子,让他立功,封他一个侯,并不是为了国家。但是这是个讽刺,全世界所有的(皇帝)野心勃勃开疆拓土都是为了个人,没有谁是为了国家幸福、世界大同的。所有的大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扩张,不扩张怎么能变成大国呢?让人家自动献给你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你想想看,中国自己不缺丝绸,它为什么去开这条路呢?没有的,丝绸之路是外面开的。正因为这样,第一,一定要使中央王朝的兵力强大,政治野心大,这个时候他控制中亚这条路才能畅通,汉朝的时候,公元前六十年,建立了西域都护府,控制了这块地方,这个时候丝绸之路通了。但是西汉灭亡以后,王莽就把西域都护府废掉了,在东汉两百年里面,西域的行政机构三通三绝,恢复了三次又断了三次,以后在大多数时间是名存实亡的。你想想看,在没有机械交通的情况下,统治中心在西安、洛阳这一带,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再到那块地方去呢?这块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危机,根本用不着去的。那么唐朝最强大的时候,它一直扩展到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到咸海之滨,这个时候唐朝在西部的中心是碎叶城,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我去看过的,是天山脚下很大的地方。但是等到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实际上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唐朝的军队已经在怛罗斯,也就是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被阿拉伯人阿拔斯王朝军队打败,唐朝已经处于守势了。那么安史之乱以后呢,唐朝的军队基本上基本全部用来对付从今天的北京出发的这一批叛军了,连河西走廊都给藏族的祖先留下来了。从公元 750 年安史之乱开始,一直要到清朝乾隆皇帝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 1759 年,才重新恢复对天山南北麓新疆的统治。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央政权有 1009 年的时间没有办法统治新疆,所以那个时候所谓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原过去的,中原过去以后也是走私的,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跟中亚之间的交通,比如说喀什,它是一个据点,然后从喀什过去到了比如说塔什干、杜尚别,然后是别的什么撒马尔罕,都往那里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么长,两千多年,哪通过呀。而且从公元九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的船队已经航海到了广州,到了泉州,到了宁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跟西亚、欧洲之间的运输主要已经不在陆上了,全部走海上了,阿拉伯人的船队定期过来,在广州,当时已经好几万阿拉伯人及西方的侨民,他们有自己的社区,被称为番坊,里面的番长等于我们今天的居委会主任,也找外国人来就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丝绸,而且中国的茶叶、瓷器,出口都是通过海上,瓷器在陆路怎么走呢?这个价值都不值的。一直到像哥德堡号,美国的中国皇后号,这些船队到中国来,他们主要也是海上,而且他们的利润一度高达百分之五百,甚至百分之一千以上,那就是因为靠了海运的优势。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讲这些对于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呢?很简单,今天,如果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我们的话,你怎

● 沙龙拾萃 ●

么调动中亚、西亚他们重建丝绸之路以及开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积极性呢?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跟哈萨克斯坦、萨法联合建立了边贸城,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这里都建的像模像样,他们那里动都没动,那建它干什么?我那年到吉尔吉斯,我们出去,出了我们的界碑,中间差不多一百多公里它是无人区,它是隔离区,那么边贸什么的那都是没有人的,它怎么跟你贸?它不像跟越南,跟印度,脚一跨两个人就开始交易了。是这样的,天山山脉海拔都是千米以上的。那么还有,我们现在看重它的油、汽,它的矿产、矿石,它的棉花。那么这个不是光你中国看重它的,那些油气田俄罗斯、西方他们也喜欢的。它今天不是只卖给你一家,那么丝绸之路之路怎么样?还有唐朝汉朝的时候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可以控制中亚,我们今天能控制它吗?控制得了吗?我们不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吗?那么丝绸之路我们今天讲到重建主要是通过哈萨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出现乌克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有这个能力像普京这么能够影响它吗?未来我们有这个打算吗?你如果投入巨资建了,大家知道这些国家都很不稳定的,最近几年出现了伊斯兰化,还有出现民族化。而且他们那里有的国家,比如像乌兹别克斯坦,就发现原来共产党的统治还比较稳定。但吉尔吉斯就不同了,美国一度空军基地都占了,而且内部老是政变。哈萨克斯坦目前还可以控制得住,但是已经有人反对说他腐败,它如果也变得像乌克兰一样,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中国到底准备用什么办法控制中亚?你准备控制吗?缅甸不就是教训吗?你看以前军政府时代,那我们好得不得了,又是建水电站,又是开铜矿,又是油气管道通过。现在军政府还没有完全垮台呢,那么现在看来昂山素季肯定要上台的,水电站人家说你破坏环保,铜矿停开了,石油管道虽然建好了,但是你将来的怎么保证它的安全呢?反过来,既然我们这样控制了,就想控制或者说主导军政府跟昂山素季之间的关系,昂山素季困难的时候我们中国也像希拉里一样这么去看看他,那么今后对我们可能就更加有利了。这个就说明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负责人的大国,那么就不能只考虑内部。那么既然重开丝绸之路,那么战略上到底有什么打算?

另外,这里还涉及到一个管理世界的综合的问题。二十年前,一批学者宣称我们要打通亚欧大陆桥,一直通到连香港的阿拉山口,把铁路连起来,将来西伯利亚大铁路被我们所取代,将来韩国、日本的货物都经过这条线到鹿特丹。现在早就打通了,连我们的货都到不了鹿特丹。其实这是个简单的算术,这条路打通了,你如果连香港的货物大批地过去了,那么新疆的货怎么办?这条铁路总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那么

我们现在丝绸之路从理论上讲已经通了,现在是重庆发一个车,郑州发个车还行,那如果每个地方都要发个车,难道这条路就只给你中国人用啊?哈萨克斯坦自己要不要用?土库曼斯坦自己要不要用?德国自己要不要用?你想象的真的做得到吗?而且全世界的趋势来讲,越来越多的货物都是通过海运,因为海运便宜呀,海运环保啊,而且海运是点对点啊,上海出去,就直接在鹿特丹停,中间不需要经过那么多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不要说国外,我们自己国家河南跟山东都在,最近宣布建立丝路经济带,河南被开除了,河南很有意见。现在丝路带只要陕西为止,那你原来打通的亚欧大陆桥不是没用了吗?像这些问题,今天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历史地理背景,我想你在考虑这个规划的时候,肯定首先考虑怎么克服这些困难。比如我们现在跟中亚、俄罗斯有几条河流,到现在谈判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欧洲莱茵河跨那么多国家,多瑙河跨那么多国家,它都已经综合管理起来了。我们两个国家、三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解决,它九个国家十几个国家都解决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条丝绸之路,能不能有这么一个跨国的机构把它真正地管理起来?中国到底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像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我想我今天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因为人类对未来做出规划、做出预期的基础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了解。当然我们也反对历史主义,认为过去知道的今天都会重复,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未来很多变化是以前所没有的,对这些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也是不能预测的。但是不管如何,你对过去了解得多一点,特别是对过去规律性的东西有所认识,那么你在应对未来的时候你会有更加大的胜算。那么历史地理因为实际上兼有不同的学科之间的这样研究的领域、跨度,以及它这样的成果。所以它比一个单一的、纯粹的历史学,或者单一的地理的综合能力更强一些,所以对未来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我们自己的学科往往吹得像神话一样,没有必要,比如一个显著的例子,我们以前讲有的人就神话我的老师,说你看他画的历史地图剑是可以守卫领土的,这个是守不住的,你地图上画的人家就会给你了吗?外蒙古 1946 年中国才承认它独立,1946 年以前怎么不去收回来呢?反过来,Hawaii--美国最后一个成立的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成立的州,有没有老百姓闹独立呢?所以历史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因素还是需要现实,需要硬实力并济,软实力支撑的。

1986 年,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历史地图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我曾经问当时的外交部法律司司长,我说:"王司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解放以后你们那么多领土谈判,有没有哪一次凭着我们的历史证据或者一份历史地图收回了自己的领土,或者就此取得了外交谈判胜利,这个有没

有?"他说这个倒没有。有什么用呢?比如黑瞎子岛,根据《瑷珲条约》也是中国的,但是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以后,苏联红军就不干了,那么我们经过谈判,总算收回了 171 平方公里,大概占一半,人家给你一半吧,蛮客气的,而且我们还补偿他一块。这靠什么,当然是实力了。而且有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主次,分清因果。比如说像钓鱼岛,我们说了很多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是我们的,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不是太重要,为什么呢?在 1972 年,日本的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就在日本公开出了一本书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不是日本的,而是中国的。1997 年,文汇报上登了一篇报道,就是日本也有学者在发表论文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应该是中国的,但当记者采访他,他马上补了一句"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说今天还是中国的"。你说这是为什么?历史跟今天毕竟有区别。你看北方四岛,俄国人敢说他"自古以来"?它不要用的,普京一句话,这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也是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付出的代价,什么自古不自古啊,睬都不带睬你的。他们已经放出来话,将来最多还你两个,其他两个你根本不要想。这靠历史吗?相反,我们跟日本的钓鱼岛之争最大的麻烦不是历史,最大的麻烦是 1945 年到 1970 年。1945 年我们是战胜日本的,那么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开罗宣言,但是各位,开罗宣言是个政治宣言,不是签订的条约,开罗宣言不一定起实际作用,日本要把它用武力夺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但是有没有讲附属岛屿是哪几个呢?有没有列张清单呢?或者画出一个地图呢?都没有啊。但是蒋介石没有办法跟罗斯福合作,去占领琉球。原来罗斯福提出琉球和中国一起管,后来蒋介石说我们一起管,实际上蒋介石那个时候既没有海军实力,同时又主要关心跟中共争夺东北,再去晚了东北被共产党夺走了,所以(蒋介石)没有去。连蒙古原来规定是中国占领的地方,银两都准备好了,代表都去了,翻译都去了,结果最后也没有去军队。那么美国宣布由它自己来接管琉球,美国接管琉球的时候公布了琉球接管区的地图,把这个所谓的土噶喇列岛划在里面了。美国还宣布了它占领的范围,东经多少度到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到多少度。而且美国以后,它的军舰曾经在钓鱼岛上打靶。但是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这整整二十五年里面我们找不到一条大陆或者台湾政府官方的声明,甚至找不到一条民间要求说明钓鱼岛是中国的记录。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所以日本为什么那么嚣张呢?它提出来不行就叫国际法庭立案,让国际法庭来审判,判给谁就是谁的。你们注意到过吗?外交部发言人讲到日本这些所谓证据的时候讲了些什么话呢?小偷把

人家东西都偷走了难道能证明是自己的吗?他用的话是小偷,没有错,是小偷,它一个战败国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呢?当时中国只要稍微说一句话,说这个岛是我们的,它敢说给吗?俄国把它的四个岛占了它都不敢声张。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如果说历史地理没有学好,中国人当时都没有学好。现在很多专家的研究找来找去都是明朝清朝,我说你们有没有本事找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找不到,你很难在世界舆论面前取得上风,那么钓鱼岛怎么被重新发现的呢?还是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这个留学生还是学物理的。当时美国跟日本的谈判要归还冲绳,他在地图上就发现这个不就是中国古书上讲的钓鱼台吗?后来他们去查,果然是的,然后发动保卫钓鱼台,即保钓运动,开始是留学生,后来扩展到华人。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和台湾发表声明:钓鱼岛自古以来是我们的。可惜忘了二十五年,这是个严峻的事情。所以了解这些历史你就知道了真正的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个人提醒政府,甚至只要政府能够公开发一篇文章说这是中国的,那就解决问题了。

当然,有的是有历史缺陷,比如说我们的南海,为什么很多岛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没有这个观念,哪里有什么海洋?普天之下都是我的,我来(声明)干什么?另外,也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影响,你说南沙的主岛太平岛距离海南岛也就一千多公里要是没有军舰能占吗?二战以后就是因为有军舰了,所以国民政府去宣誓主权,去肃清日本残余势力,去调查那里情况,派了太平号军舰到那里,这个就命名了太平岛。中业号到了中业岛,永兴号到了永兴岛。要没有这支海军,没有这些行吗?靠什么去宣誓呢?当时李准去巡海,因为设备比较落后,很多地方没有像后来这么大规模去。但是也很了不得,树了碑,命了名。可惜国家没有这个实力,能够在这些遥远的海洋上面实行有效的延续的行政管辖权。所以我们今天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我们周围的国家,因为距离它们近,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而且我们跟他们要在南海共事,各方面都不改变现状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最近我们都强调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说我就是要在建设、要扩大呢?不行的,要做也要悄悄地做,要找出原因来做,你不能够完全这样。所以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是重要,但是不要神话它。我们今天讲科学,如果说它还有什么缺点,就是一些历史资料你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还有,有些时候,在史料太少的情况下,要量化风险。推断错了就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优点,那么对未来还是有很重要作用的。

上接第八版——

没这信号,所以他就不能去想象有两种飞行器跟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相关的,所以在对想象力这个词做了思考之后,你可能大致有把握说他没有什么想象力,这想象力来自哪儿,这想象力来自,我们去同一个地方却能够有不同的走法,如果能这么走也能那么走,这个世界就不再是一个使然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全使然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由某些元素构建起来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可能的世界,就是它可以这么构建,也可以那么构建,这个跟我们对这个世界个感受是一致的,只有有语言的生物才会把世界看做一个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我承认这把我们将带到一个更幽深的领域,我们今天就不再展开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几乎不会去想到你没去过的地方,但是在我现在所看的这个意义上,你就能,就是当你学会的思想之后,你就会去想那些不知道该怎想的东西,而这样一种东西它只是作为一个不成形的东西引导你,你会通过种种努力去把它打型出来,找到达到那里的道。但是你可能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找不到现成的道,你怎么办,你就可能会胡乱地编出一些表达式,就是在表达那个不可思议之事。但是,这没用,你说它指的是不可思议之事,但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不可思议之事。就像我们语言刚开始产生一样,如果我们更多的人有了这样的向往,要到一个地方去,而且我们跟你有一种这种相近的感受,我们逐渐地就会有一些新的词,甚至会有一些新的语法会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新的词刚出现的时候,除非你给他一个定义,我说的不是科学种给出定义的新词,而是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新词,它第一次被使用的时候当然谁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至少不知道它的 connotation,但他只要被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新词,这个新词就表达了过去的人们无法表达的东西。当然,反过来过去的人能表达的东西可能就逐渐地湮没了。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去学习这些古典的,我们就不能够知道怎么表达那一类的感情,那一类的知识,那一类的希望和想法。但是,全说完了之后,我还要说的,字词语言是那么那么得 powerful,但是,它仍然不是万能的,的确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表达不了,用字词语言表达不了,这个你可以用音乐去表达,可以用绘画去表达,可以用肢体语言去表达或者用会心一笑去表达,这都不是问题。

语言之为交通设施

主讲人介绍:

陈嘉映

当代著名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1981 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研究生；1981–1993 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助教、讲师；1984–1990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博士生，1991 年获博士学位；1993 年北京大学执教；2002 年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 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

都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经验和思想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语言传达的是共有的思想。

那么这个想法,就跟一个关于语言本性的比喻一样,这个比喻是这样的,我估计大家都听过这个比喻的不同版本,这个比喻是说,我有一个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因为咱俩不可能就有通灵术了,大多数人之间没有,那么我就要把这个语言就是用,着装上,穿上衣裳,或者打成包裹,这样我寄给你,你收到了这个包裹,你打开语言,拿到了其中的思想。这是有些语言的教科书上,在序言或导论里就直接直截了当的这么来解释语言的本性。但是,你稍微多想一点,你就觉得这个比喻恐怕是不行,这个缘故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要寄给你,比如说寄给你一盒月饼或者一包糖果,那么我把它打成包裹然后寄给你,你打开这个包裹,里面那个月饼和糖果是在的,也就是说你不仅收到了包裹皮儿,你还收到了那个糖果,它包在里面。但思想就不是这样,我把这个思想打成包裹寄给你,但是你收到的时候,你打开里面是空的,因为你只收到了语言。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种寄送包裹的比喻,虽然我们经常能读到,而且我们自己也有可能这么来解释语言如何传达,但是它实际上不 work,实际上就明显的不行,但是你可以说我怎么想办法把它实行比喻再变形是不是能行,在可见的变形范围内都不行,这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思想用语言来穿这个衣裳或打成包裹,这个基本上都是不通的比喻。那么,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语言的本性。然后到 19 世纪 20 世纪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沃尔夫萨丕尔假说,这大家都听说过,讲座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介绍了。总而言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我们也把它叫做语言决定论或者语言牢笼论,意思就是我有这样的语言,它就会决定我去怎么想,这就跟我一开始讲的倒过来了,一般来说,是思想决定语言,我有什么思想我就表达成什么语言,现在它说语言决定思想,它有很多很多论据就是关于语言决定论的论据,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不同的语言的颜色词,这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有两个颜色词,实际上差不多就是黑白了,也不叫颜色词。有的语言是三个,有的是五个,有的

是几十个。那么,语言决定论就有义务去确定,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颜色词。比如说三个或者五十个,那么这个颜色的辨别就有问题,就是差距,那么这方面我们要请教心理学的专家,结果大家就说语言的不同是会影响我们对颜色的感知,但是远远不像语言决定论的那个所设想的那么巨大,稍稍经过学习时候,一个只有两三个、三四个颜色词的民族很快就能够,如果不是说完全达到的话也能接近于,有很多颜色词的这些语族人的辨别能力。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网上都能读到,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虚拟式,中国语法里头没有虚拟式,像 if John goes to the hospital,就是这个虚拟式,据说在美国测验, John 去了没去医院,97%都答没有,可中国人只有 7%是答了没有。这个是语言决定论的人,用来证明语言对思想的影响。

那么,这语言决定论本身就是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语言决定论肯定是错的,但是语言决定论站不住并不等于它在语言思考史上无足轻重。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从我们最初级的对语言的想法,就是好像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发明了语词去指这些东西,然后去用语言来当做语词,来当做象征性的代表,来代表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叫语言指称论,这是对语言的最简单的反思。那语言决定论,我觉得就是比这个指称论更深入了一步。它就考虑到语言不只是被动地适应这个世界,而是语言本身对我们感知世界会发生影响。虽然这个极端版本是站不住的,但是它的确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思考。到了大概在 20 世纪中叶的时候,语言决定论就比较退潮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思考都是反对语言决定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用语言在思考。在社会当中我们到底用不用语言思考?很可能是用一些图像在思考。举个例子吧。第一就是说我们小时候都做过几何题,现在有人还在做,大多数人不做的是吧。我们在思考这个几何图形的时候就有可能一个词都没有过怎么解这道题,但是我们很可能在脑子里拼这些图形或者画辅助线,甚至把辅助线画到纸上。这个



我们是用好多图形在思考。那么,这个意思延伸的思路论证人他就特别愿意去在科学论证史上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大家都比较知道双螺旋,这个大家知道就是基因的结构,染色体的结构双螺旋。这种就是通过图像的思考得出的最初的灵感或者像苯的结构。爱因斯坦的曾经有一段话,他说我思考的时候语言几乎不起作用,就是一些可控制的 images、意向或者图像,我通过这些东西在思考。那么有了,我现在就是在进一步,可能读语言学的都知道在 MIT 有一个在当代可能是最重要的语言心理学家叫做史蒂芬·平克,写了好几本书都是特别 popular 的。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叫做思想语假说,或者 Languages of Thought。它的大致意思就是说汉语、英语或者法语这些语言就是我们叫做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当然每个民族都不同就不消说了。但是在自然语言的下面有这个东西叫做 languages of thought。这个东西是所有的民族都共同的东西。当然你一听就跟乔姆斯基这个普遍语法是同类一路来的。当然史蒂芬·平克在某一种意义上它是乔姆斯基学派,虽然也有区别。那么这个就跟语言决定论 180 度反了。语言决定论是自然语言决定我们怎么思想,现在思想语假说跟自然语言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没有那我们干嘛要自然语言?它还是回到了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当我们要交流的时候,我们才把思想语言穿上一种自然语言的语言,比如说自然语言的衣裳,对就是这种说法。比如说你要想跟一个法国人交流,你就要把你的思想就是要穿上法

文的衣裳,要是跟英国人交流,你就穿上英文的衣裳。我这个内容比较多,我知道大家跟起来可能比较有点累。前面还好说,我讲话比较通俗。但是这些想法讲起来可能还是会比较累,那么前面讲的都是别人的。那么我现在等于就是介绍了个背景,就是语言本身的思考相关的是哪些问题,当然比这个要多得多的多。但是,我挑几样大家有可能会听说过或者就是说自己思考语言本身每天你可能也会这么想,那么现在我就来思考思考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像爱因斯坦说的一样,其实也不用他说,我们自己一回想就知道,就是我们一思考我们脑子里就会过好多多东西,这个没有疑问是吧?我的问题第一当然也就是哪个时期?什么东西?第二也就是它们跟我们的思考是个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在上个礼拜在一个聚会见到的时候出言不逊就得罪了他,但实际上他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很冒冒失失的就得罪了他,我现在就是向他写封信来就是向他道歉。但是写封信也不是太容易。因为一个大人要向人道歉总是觉得满纠结的是吧?用什么口气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下笔有点困难,这时候有好多多东西就是在脑子里或者心里就过了。你会过什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就是什么都可能。可能是在回忆当时的那个沮丧的表情或者你当时说话的自己的口气,或者你是在浮现过一个什么中文词语,我深感抱歉,这种话太

● 沙龙拾萃 ●

太老套了是吧?或者就是你,你甚至就是可能,如果你在酒桌上这么做了,甚至可能酒的气味都是你心理活动的一部分.这个可能吧?就是漫无边际,什么都可能.问题我现在就是想说,这些东西在什么意义上它是我思想的一部分?这个关键的是假设我现在这个写了这封短短的信,假设你在一个相似的情况下也写了一封短短的信.但是可能在我们脑海了所浮过的东西是风马牛不相干,风马牛不相及.

可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休谟曾经说过三角形三边的中线是在同一个点上相交,那么你是学几何的学生你就要学这个定理咯.你在学这个定理的时候你就可能脑子就会想三角形,那么我就问了:你过的三角形是一个大三角形还是一个小小三角形?是个粗边三角形还是一个细边三角形?是个锐角三角形,是个直角三角形?是个略带红色的三角形还是略带黄色的三角形?你脑子过的东西,我学的是同一个定理,而且咱两一样聪明或一样傻.我们最后都学会了这个定理,但是在脑子里过的东西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你说过的东西都不同,但是它毕竟都是三角形,但第一它不一定是三角形,我可能过的都是三角形的边是吧?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你怎么知道我过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的三角形是吧?它可能是个曲面.这我不去说它,我只想说你不能说我们俩过的都是三角形.因为这时候你说了三角形这个词,我脑子里过的是图像,你不能说过了一个三角形这个概念.就是第一段我们说过了一个三角形,那当然都是三角形,现在休谟想问的就是脑子里的意向有什么共同点,而不是问我们用来说你想的词有什么共同点.它的问题恰恰就是说,当我们用同一个词的时候,它们指的是同一个意向吗?这个问题.当然我讲休谟不是说只有休谟这么讲啊,只是说休谟的这一段比较著名而已.那么这一段就对语词的指称论就提出了一个相当致命的打击.就是语词在于指称类的,无论指称我心中的观点还是指称外部的东西.比如说指柳树,你也不会指你看到的柳树.高的柳树矮的柳树?大的柳树小的柳树?早柳还是河柳是吧?或者春天的还是秋天的?长得完全不一样是吧?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两棵柳树都是柳树.春天的柳树和秋天的柳树都是柳树.你听到了一点点你就定论.但是你定论的方向不同.最后它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语词保证了它们的共同点,或者说它们的共同点保证了我们使用了同一个语词.

我这么说又有点过了,稍微过了一点,但是你们听到这背后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在家坐着.我很可能在读小说,在看电视,还是在干嘛.这时候砰砰砰有人敲门,我说请进,如果你进来说刚才陈老师你说请进的时候你脑子想什么,第一就是我的确就是谁知道想什么,

第二就是想什么不相干的事.我说的绝对一点只是不管想什么,那我在这种请进的这种场合,我几乎可以说我不假思索的,就是你别问我想什么,我没思索什么,我没思考什么就是对环境的一个反应.就有点像你拿一块砖头向我扔过来,我就躲开一样,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脑子里过什么实在不是特别相干.当我在美国住了几年之后,那么人一敲门,我会说 come in ,please, 我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说出英语了,这么你说这时候我脑子里不再过情景的这个话,而是过英语吗,当然也不是.

我这时候想说的就是回到我最早提出的问题,就是用英语思考,就是当你问出你能用英语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给个初步的回答,那么一开始我们倾向于认为,就是你用什么思考,就是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脑子里过的是哪一种语言和哪些东西,但是实际我们思考了以后正好相反.就说如果我现在去一个外企,它需要一个会点外语然后我去面试,我去应聘的时候,我就事先把英语该怎么说我就一句一句的全都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都过得挺好的,那么这种情景的话就恰恰是我们说这个人懂英语,但是他不能用英语思考,就是我们跟外国人就像我这种,英语半吊子的这种人跟外国人说话的时候我都是先会说一个汉语,汉语听不懂我就会在脑子里翻译成英语,然后我把它说出来.如果我脑子里过的是英语,那就是我不会用英语思考.你们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如果我在说出之前在脑子里变换英语不会用英语思考,那么会英语思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比如说我在美国呆着,有人说 come in ,please.这个时候,我是在用英语直接说 come in ,please.那么我后来英语有点进步,不止会说一句,然后跟外国人在交谈的时候,我脑袋里不再是先说出汉语把它翻译成英语,而是我脑子里不管是 what’s going on in my mind,它说出来是英语,这个就是我们至少是问你会不会用英语思考的人真正想问的问题.我觉得我不是强加给他,真正要问的是你的英语水平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种娴熟程度.什么程度就是不管你脑子里过的是是什么,他招呼语言的时候他首先招呼的是英语或者他至少是可以招呼用英语.

那我把这个从形式上说一下.其实当我们说我们用什么来思想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心里浮现什么,而是说思想或者思维活动在表达自身的时候他直接达乎哪种语言.这有点绕口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是字面上大家都还在 follow 的.如果你 follow 到这儿,你就领会的蛮好的,我就要接着说了,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心里在想什么通常讲的那个想法就是那种尚没有它自己形式的东西,它是没有形式的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脑子里再过什么,心里再过什么,我们在学一个几何定律的时候过了是三角形,过了中线,过了交点.但是,无论过了什

么,它都不意味着我在想什么.因为,我可能在过这些图形的时候根本不是在思考关于这些三角形的三条中线的交点是不是同一点.我完全可能在思考三角形的三条中线是不是要相交,或者它们是怎么分割三角形的.我画一张三角形的参考图给你,你完全不知道我在思考什么,可能性是无限的.正如我画一张列宁的图,有人会说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会说这是杀富农的人,还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额头很宽的男人.意象本身并不能说明你在思考什么.你所思考的就是达乎语言的东西.看到的東西一样,人的思想并不一定是一样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人的思想可能是一样的.这些皆依赖于最后达乎语言的表达式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此所说的表达是未成型的東西成型的过程.它不是现成的东西的转移,比如说把钱包从桌上放到口袋里或从桌上放到抽屉里.你的想法不是钱包;直到它达乎语言它才成为一个成型的東西,在这之前,它什么都不是.

关于这一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我今天是想沿着把语言中常见的一些问题都说一下,所以每个问题就蜻蜓点水地提一提,不深入去讲了.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穿上衣服"、"邮寄包裹"这些说法,的确是不靠谱的.因为这是未成型的東西转换为成型的東西,而非成型的東西拿什么来包装的问题.就此而论,刚才说到的"思想语"的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不管有没有"思想语",它们依然没有回答未成型的東西是怎么成型的.假设自然语言之下有"思想语",不管这个假设最后能否实证成功,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在形成"思想语"之前的想法是什么.那些气味、图想、颜色是怎么变成"思想语"的?我们不能简单说思想语是对气味、线条、颜色的描述,这样不过是在无穷倒推这个问题.无论怎样推来推去,始终绕不过"不是语言的东西怎么变成了语言"这个问题.

关于我刚才讲到的表达,我在此想做一个脚注."表达"这个词语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用法,不要以为它只有一种用法因此误入歧途.至少在我讲的内容中,表达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被砖头砸到脚了,痛得呲牙咧嘴甚至眼泪直流,这个"呲牙咧嘴"就是一种痛苦的表达.再如一个人听到了好消息就欢欣鼓舞,他的笑容即是一种快乐的表达.诸如此类,这种表达是多种多样的.这种表达跟语言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这些表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需要学习的,简单说就是本能.像这样的很多东西可以通过身体等表达出来,但语言是不行的.无论如何,语言是需要学习的.现在就送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学习语言以便能够表达自己.这时的语言不是我们心里的东西,它是不需要学习就已经存在的,就像汉语,它已经存在,总会有

人去学的.这时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语言系统.呲牙咧嘴表达了痛苦,不能说用呲牙咧嘴表达痛苦.其实在表达里有两件事,其一就是你要有想表达的想法,不管是痛苦、欢乐还是其他.其二,要掌握语言表达的技能,否则就可能表达不出来或表达不好.同样是道歉或感谢,善于表达的人表达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也有更深层次的表达,如表达思想或感情.当然,不能说呲牙咧嘴的表达就不存在好不好问题了,至少对演员来说有.演员把表情、体态等表达方式就像学习一种语言一样来学习,就能较好地表达出一种感情或其他内容.语言在大多数时候,比如我们聊天时,是不怎么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的.我们需要知道这并不是一种本能,这种情况就像系鞋带,是一种娴熟的操作.语言对我们来说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从小学习,说得特别纯熟.尽管如此,种种征象表明,它还是异于本能的反应的.我们经常分辨一个人是否善于表达,而且有时候也会判断自己的表达.比如可能想要表达一种感谢,可话一说完就自问我怎么表达成那样了?本来想表达感谢,结果人家板着脸走了.

不管怎样,且不说哲学思想或语言学思想这种水平的表达,我拿"道路"来比喻语言,是一种远远优于"穿衣服"等等的说法.这有点自卖自夸之嫌,但关键是用道路来阐释语言,几乎不是一种比喻,"道"即是"路",就是"言说",不是勉强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最根本的想法中,已经把它们叫做一回事了.如 communicate,"交流"和"交通"是我们在翻译中选出来的两个词,人为地做出了区分.也许把这种思路叫做"比喻"不太恰当,但下面为了叙述方便还是把它叫做比喻.这种比喻能走多远?我觉得它能走非常非常远.我首先要讲的一点是这个"道路"系统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而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个系统.如果用内外来说的话,语言是我们外面的东西.我们学习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把语言内化得特别娴熟.是什么?就像我们走路从教室到食堂,从食堂到宿舍,这是不假思索的.说话就是把一种意思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个上下文中,我们可以把说话理解为要到哪里去,借助一个已有的道路系统到达目的地.说话就是行路,语言就是道路系统,所以说说话和道路系统在一个意义上完全是两回事.说话是依赖于道路系统并且娴熟地利用道路系统.在上海,如果你是"老上海"或者在上海住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就对上海的道路系统会相当熟悉,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有的人可以选到最快的捷径,有的人选择适合搭车去的路,有的人选择了适合开车的路.通过这个道路系统,我们到任何一点都有许多方式.但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或者由于个人对道路系统的熟练程度不同,我

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但最终我们都到达了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实现了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已经表达了你所要表达的,但是有人表达得便捷,优雅,有人表达得稍微笨拙、累赘一些.但不管表达得怎么样,都依赖于首先要掌握这样一个交通系统.假如要在上海生活,就要在不同程度上了解上海,否则就出不了门.更进一步说,上海的交通系统不只是路,还有其他很多设施,比如红绿灯、斑马线、隔离带、立交桥等.就像一种发达的语言,而不像两岁孩子说的语言.两岁孩子的语言就像道路,我们的语言则是完善设施的系统.我们不能在红绿灯上走路,但它们对于交通也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汉语中有很多虚词,它们就是能让语言适当工作的机关或设施.多种多样的语言设施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学会这个整体,去运用并达到目的,即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

既然语言是在我们之外的,那它最早是从哪来的?古语云:"道行之而成".最早我们没有复杂的道路系统,只是简单地两点一线走向目的地.但两点一线也有问题,比方说爬山,山上有沟壑,有峭壁,不可能两点一线直接到山顶.但时间长了,爬的人多了,就慢慢走出方便的小路了.这条小路的功能却不仅仅是方便我们从一点到另一点,它还有其他功能.我们有时需要到达多个地点,比如在草原上,可能需要去邻居的蒙古包,要去一个地方打水,到另一个地方劈柴.不单是我自己,其他人也有各种不同的需要.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道路网,它就使得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不是直接去的,而是借助了很多路的某一段.语言和动物信号的基本区别在于,动物信号是直截了当的,一个信号代表一种意义,是天敌来了还是猎物来了.但语言不是这样.语言中有很多词语,比如说"我恨你"和"我不恨你",它们的意义差别太大了,但只有一个字是不同的.语言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不是直接表达的,它把任何一段路都拆成几段路的组合.这样的坏处是我们需要绕弯,不像动物那样直截了当;好处则是用常用的两三千词语加上语法规则可以表达出无穷尽的意义.使用语言使得人类可以想象一切可能性.虽然"语言决定论"走得有点太远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道理的.语言也塑造我们的思想.就像道路系统本来是为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服务的,这跟我们的设计是有关的,甚至连设计都没有,路都是我们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但是,一旦有了交通系统,它将影响你要去哪儿,促使你选择经济便利的目的地和路径.汉语和英语又是两种不同的交通系统,所以英国人倾向于产生一种想法,中国人则自然地产生另外一种想法.比如说,在没有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们表达日常的想法不会出现表

● 沙龙拾萃 ●



达困难,当然诗人和作家除外。可一旦学了英语,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用英语说得很清楚的问题,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要转换成汉语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恰当了。英语的道路系统和汉语不是重合的,所以可能要到达某个目的地,用英语的系统很是便捷,如果非要用汉语的道路系统引领,就会显得很别扭、不方便,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到不了同一个地方的,只能到目的地附近。语言不同,但表达的思想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话题,这里我就点到为止。

那么语言不同,表达的思想能否相同?举个例子,"How do you do"和"你好"的意思是一样的吗?前者正式,后者日常,二者不尽相同。"Dear professor"和"亲爱的导师"能是相同的吗?"dear"用得很多,一个词的使用频率跟它的意义是有很大关联的。对于一个英国学生来说,他用"Dear professor"是相当正式的称呼,但如果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么用,教授可能会吓一跳:有什么可"亲爱"的?当然现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了。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一句英语和一句汉语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这句话,无论如何我们是要有所保留地讲的。如果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做翻译就太愉快了,对不对?那样机器翻译早就成功了。可是意思不一样,那就不能叫"翻译",而是改写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系到柏拉图讲的共相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完成。也可能有人弄清楚了,我还没读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两种不同东西的本质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显然,不能简简单单说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是?这就牵涉到我们讨论的是两种定型的东西背后

那种不定型的东西。思想本身没有形状。试想一个对汉语句子有定型的,一个对英语句子有定型的,它们背后的不定型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它们是一样的,因为反正也没有定型。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如果问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这就让人崩溃了。因为你要么就用汉语把它讲出来,要么就用英语把它讲出来。就像一句古诗翻译成现代汉语,现代诗或现代语言,那我要问他,是不是同一句话诗,要是同一句诗,是哪一句诗啊,你就不得不用现代汉语或古代汉语讲。所以,同音被称作哲学中最困难的问题。我现在并没有完整地展开说这一问题,我们至少在触到这一特别困难的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有些东西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我就稍微提一下,作为结论。我就用几个命题的方式。第一,我想说一下思想和思维。这个我不展开,我们会外语的都会说,思想和思维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它们都是 **thinking**,但是,你们也听到了,要我说,它要是思想和思维两个词,它多半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又在谈翻译了。我们都有这种经验,这个问题你在英语里问不出来,思维和思想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在英语里怎么问?你问不出来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讲翻译了,我就讲思维和思想这两个汉语的词。我也不多论证,思维更多用于心理学上说心理学意义上,是在讲我们心理活动;思想基本不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讲的这个思想,我们一开始提问的时候讲到这个词,就说我们是否用语言思想。联络我们刚刚所说的语言是一个表达体系,我就会说,这是一个命题而已,我想说,思想就是以语言表达为目标或归宿的思维活动。我这么说是这个

意思,我们有时候做白日梦,就是想入非非,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把它叫做思想。但是心理学家会说他是在思维,他在想入非非,但是并没有在寻求表达。而平常我们的行动语言,比如讲课,或者日常生活中随便说点什么,这时候你的心理活动或思维都是要达乎于表达,都在寻找着表达,也许这是个累生的过程。你总会觉得词达意了或不达意了,当然如果情境特别简单,如果你再不达意了,那就是有语言障碍了。但如果你要是碰到的事情稍微复杂一点,比如这个问题。接着我们就要谈,我们现在说的少一点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讲到美学,一讲到艺术哲学,一讲到诗学,都讲到形象思维,哲学家和科学家是概念思维,诗人和画家都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什么意思?挺讨厌的,人家讲点,他就老在那琢磨啥意思,好像他啥都听不懂,不是装不懂,他是真不懂。现在我们就知道,形象思维不是指画家在画画的时候或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脑子里有大量的形象,因为哲学家和科学家一样,他在思考科学问题的时候,他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他在做所谓概念思考的时候,他脑子里也过的是形象,不是科学。

形象思维,我要把话题稍微扩展一下,我刚讲了语言,我们的思维达乎语言,我们几乎始终是在字词语言,这个意思上,这是我们狭义的语言,汉语英语这是一个词组成的语言,但我们都知道语言有比较广的用法,这个用法,比如说绘画,我们当然有绘画语言,绘画语言使用色彩、线条、明暗等等,当我们讲音乐语言,这也是要学习的。还有肢体语言,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走的再远一点的话,我会说我们的行为也是一种语言,绝大多数行为,实际上我们用到了行为这个词,差不多就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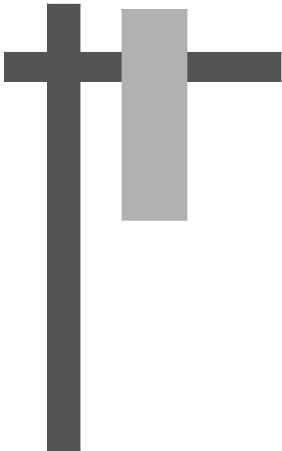
说它不只是在达到目的,也是一种表达,这些我就不细说了,除了字词语言之外,我们还有好多好多语言,但是他们跟字词语言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单独的话题,字词语言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如果要用一句话把它的独特地方说出来,其他的语言除了构成语言的一个环节之外,它本身有着直接的意义,举个例子,比如红颜色对于画家来说是一个词,但是红颜色哪怕不在构图中,一个单独的红颜色就有意义,比如说它可以让公牛疯狂起来。音乐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音构成了不管是十二音谱系还是五音谱系,总而言之它构成了曲子中某个环节,就像一个词一样,但这个音直接起作用,深沉,等等,它直接就有品质。但是字词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只要你们学过肯定都知道,就是只要它离开了这个语言体系,它都不说什么,那么,也恰因为它离开了语言体系,他啥都不是,所以字词语言是一切语言中最 **powerful** 的,最强有力的,它们的区别我就不再展开了,我只想说我们有的好多种语言,当然也就能想到,一个人在表达他思想的时候,他可能选取不同的媒介,字词语言使我们从傻子到聪明人都会的,都掌握的,最公用的,但是对有的人来说,你们看电影吧,他那个丈母娘呱呱啦啦说,对莫扎特来说,他不会描述他丈母娘在干什么,对莫扎特来说,就会变成一些音符,然后组成某种旋律啊或者一种曲子,因为我们读过一些莫扎特的传记,我们都知道,莫扎特肯定是用音乐来思考世界,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的想法都是直接表达在语言中,那么莫扎特明显的是对整个世界的感悟,都直接表达在音符中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设想莫扎特,如果他也像我这样,英语说成汉语,然后在脑子里慢慢编制出英语,然后再说出来,那就不可能了,因为我们读了传记我们就知道,他的那些稿子那些乐谱,写出来就是绝世音乐。所谓形象思维,我的结论就是思想思维不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有形象,而是我们的思维达乎形象的意思,对一个画家来说,表达的思想的形象,对一个诗人来说,或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表达他思想的是一些具象的东西,当然现在这种语言,他这个语言不是一般的所谓概念语言,他现在不在塑造人物,但是旧的时候,它会塑造一些形象,他要表达思想的是一些形象。形象思维你要这么去理解,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背景中。就是我们有多种多样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会随时在这些语言中 **switch**,但是最基本的是字词语言,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我们会说,爱因斯坦那个意象是不是语言?我想说,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家有时候是挺古怪,爱因斯坦这个关系,他就是人家下海的时候,他随便说了几句,但是即便是随便说了几句,他都用到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词,就说,我不用词语,我用了一些可以随意控制的意向,而这个随意控制的意象,爱因斯坦就已经无意中,我觉得是无意中,因为他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是吧,他已经说出了最根本的就是这个画家他是能够控制色彩线条的配置的,一个几何学家能够控制图形之间的配置的,就像我们可以控制语词之间的配置一样,当很多意向从我们脑中流过的时候,它不是死象,但如果从我们脑中流过的这些意象是可以控制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就可以组成一个语言,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几何图形,它不用一个词,单用三角形、线条、角度,他就说出了完整的定律或更多。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子语言。

现在我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谈的挺多,中国人比西方人还有兴趣,就是关于不可言说这个事,到底有没有不可言说的东西,我想说这事我不能展开分析,但是我在短短时间里就给大家灌输了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相信你们可能还不能把这些碎片,因为我毕竟也想了二三十年了,我不能指望你们在50分钟或60分钟之内,我在想什么,你们都很清楚,但如果前面的你们都还 **follow**,有点体会的话,你可能会对不可言说这个事另外有些想法,至少知道你要去想些什么,要不就是我所读到的这个有没有不可言说,从先秦到魏晋到最近的不可言说,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就是个立场一个感觉,那么我想说,一般说起来,这个问题就可以还原到,我想去的地,无路可通。那么,你可以分几种情况来看,一般说起来,我想去什么地儿,这个想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跟着道路系统,你差不多是在你的道路系统中学会想去哪儿的,我不想走语言决定论这么远,因为你还有好多回旋的余地,因为你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道路等等,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语言决定,语言的确不决定,但是它诱导你,它诱导你的目的意图,就是你想去哪儿不是被语言决定的,但是一般的人不大会想到去这个道路系统带不到的地儿,甚至时间长了,或者不叫时间长了,或者在一个意义上,你都不会去想那个道理带不到的地方,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辩证,在一个意义上,到底想去哪儿,你要说我没去过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但是由于语言不是信号,我刚才讲信号是一对一的,所以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没有交流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想象力,因为这信号要不就有,要不就是没有,现在比如说天上来了天机的危险,它就有个信号,你要区分有人驾驶的飞船和无人驾驶的飞船,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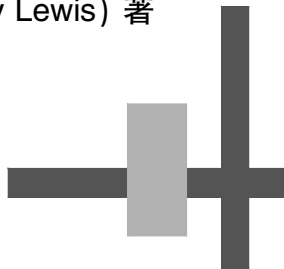
——下接第五版

◆ 导语 ◆



本期书目：

《批评官员的尺度》
【美】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

赵弢

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与偏见,可休矣! ——中国人都应该读读《批评官员的尺度》

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还只是在"发展"中,且发展艰难,因为种种因素在阻碍着其发展。一个大的障碍,就是人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与偏见。

一

谈到自由,我们马上就会听到"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这样的话。一个推理公式就此被建立起来:自由>绝对自由>绝对的是不存在的>不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轻而易举的便把自由给消灭了。还有一种说法,"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在任何国家,自由都是要受到限制的,美国也一样。"所以,"限制"是天经地义的,自由则不是。此外还有诸如 "我们所允许的是正确的言论,错误的言论则不能享受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姓资姓社"之类的,种种说法。

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也普遍存在着,害怕言论自由会带来"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稳定"、"谣言泛滥"、"引发社会恐慌"等。

鲁迅当年要打破"铁皮屋子"的"呐喊",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真是要被视为"狂人"的"呓语"了。人们习惯了"铁皮屋子",习惯了它所提供的"安全"、"温暖",至于它同时带来的封闭和窒息,那是漫漫来到的,暂时可以不必考虑。一旦有人要打破铁皮屋子,人们马上就要面对对他们来说一个陌生的世界,却是令他们恐惧不安的--加上被"用心良苦"的人大力描绘成"谣言四起"、"混乱不堪"的景象,会立马激发人的应激反应,反对!

铁皮屋子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的铁皮屋子,是会令人窒息的,最终的结果是悲惨的。要打破铁皮屋子,首先,就要消除人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与偏见。

这里有一本书--《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消除恐惧和偏见。是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

二

《批评官员的尺度》书的原名是 Make on law: the Sullivan and the First Amendment,直译为《不得立法侵犯:沙利文案》与第一修正案,其中"不得立法侵犯"指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翻译者何帆将书名翻译为《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批评政府官员(警察局长沙利文)的言论尺度,以及言论自由的尺度的问题。

作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生于1927年,是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曾任编辑、记者,两度获得普利策奖。1982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麦迪逊讲席"教授,讲授第一修正案与新闻自由。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刘易斯正好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专门负责与最高法院有关的报道,和参与此案的大法官、律师、当事人都很熟悉。这些资源为他日后写作此书提供了很大帮助。

这本书的翻译者也很值得我们关注一下。何帆,1978年生(已经是70后的尾巴了,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准80后的人了),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2006年获刑法学博士学位。现在身份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业余从事著述、翻译,著有《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等,翻译有《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上海三联,2010)、《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做高法院之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等。作者曾做过警察、刑事审判工作,现也从事司法改革调研、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又有很高的学历,可谓一位学者型的法官,他所翻译和推荐的这本书,很值得看看。

三

《批评官员的尺度》讲述的是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有关的故事。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广告描述了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批评了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广告有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法官判令时报作出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纽约时报》上诉到最高法院。1964年,大法官们以9票对0票,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判。

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通过以来关于言论自由的又一重大法律事件,被视为一个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正是对英国统治者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反思和警醒,美国的立国先驱们制定了美国的权利法案,尤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

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这一宪法条文,为美国言论出版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这不单是美国的,也可谓是人类自由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然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毕竟只有这么寥寥数语,无法涵盖言论出版自由中的种种问题,后面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言论出版自由仍存在很多的恐惧和歧见。

比如:
散发反战传单,是否危及前线将士安危? 穿着写有"操他妈的征兵制度"的外套出现在政府办公楼内,算不算扰乱社会治安? 当众焚烧国旗,有没有亵渎人民对国旗的神圣情感?

一句话,言论自由的边界,尤其是政治边界在哪里?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回答了这个问题。

四

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以9票对0票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作出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

● 主题书评 ●

是公民的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uninhibited)、充满活力(robusts)并广泛公开(wide-open),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

这起案件的判决,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次深入的解读,使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焕发出活力。《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推动美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此后的相关判例也都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依据,表达了同样的法律精神:"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年]);"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斯奈德诉菲尔普斯案"[2011年])。

美国建国先驱麦迪逊在抵制1798年《防治煽动法》时,发表了他的名言:"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力,那也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尽可能保护政治性言论的自由,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确保公民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利——哪怕这些异议激烈刺耳、放荡不羁",1964年的大法官们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的立场,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含义的解读,与美国的建国先驱杰佛逊、麦迪逊等不谋而合。

五

《批评官员的尺度》并不是仅仅讲述了一个《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而是以此案为叙事主线,串接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涵盖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此书所给出的答案也并不仅仅局限在"言论自由的政治边界在哪里"的问题,还有由美国言论自由史所总结出的重大言论自由理念和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对于我们消除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与偏见,很有帮助。

如何获得真相、真理?如何对待谬见?

英国哲人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在《论出版自由》、《论自由》中表达了这样的理念:

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的观点自由的表达、论争,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能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一

种言论如果有害,就需要更多的言论来校正、稀释、中和,而非强制禁止,令万马齐喑。

错误言论有发表的自由吗?

"在关于政治话题的激烈争论过程中,难免会有人情绪激动,甚至有过激之举,大家唇枪舌剑,激烈攻辩,多基于各自有限认知,这些认知当时或许被笃信不疑,事后却可能被证明是断章取义、错谬曲解。有时,往往是那些合理却又无法证明的怀疑,又或未经确认的‘内部消息’,暴露出官员的无能、过失或恶行……如果用诽谤诉讼威胁那些因真诚相信错误事实而批评官员者,或者要求批评官员的出版物必须证明自己提到的每一处细节都绝对真实,必将扼杀所有对政府或官员的批评。"(《华盛顿邮报》针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意见书)

"尽管存在着滥用自由的现象,但从长远看,这些自由在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来不拒绝对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言论进行保护。"(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书)

"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言论自由应容忍错误存在,甚至是一些严重错误。仅仅保护实事求是的陈述是不够的,因为人们有时会因害怕犯错,而不敢对政府提出批评。因此,为了防止人们自我审查,必须允许他们存在"犯错的空间"。(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书)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之一-----它不仅适用于无害的、顺耳的‘资讯’或‘思想’,还适用于那些令人反感、震惊、愤懑的言论。这是一个多元、包容、开放的社会必然的要求,缺乏这些,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社会’"(欧洲人权法院)

如何界定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避免言论自由的权利被恶意滥用?

给言论自由边界外的言论,一个明确的、清晰的、可测量的界定标准,美国历史中积累出了诸多的界定原则和标准,如"事后追责"、"明显而即刻的危害"、"公众人物"、"确有恶意"、"罔顾真相"等,既防止言论自由权利被滥用,又防止掌权者肆意压制言论自由。

六

言论自由当然有自由的边界,但,可怕的不是没有边界的言论,而是没有边界的权力。可怕的是掌权者想查禁什么言论,便用堂而皇之的理由,动辄以"谣言"、"煽动"、"危害社会"等污名、罪名,禁止他们所不喜欢的言论。体现法治的精神,便要限制这种狂妄的、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的、致命的、自负的权力,而给言论以更大范围的自由边界。

舒张与聚合:美国社会民族性一瞥——《批评官员的尺度》读后感

实验,美国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项目研究生

据说,每个民族都有其社会与民族的特性。但特性并不等同于优缺点,而更近似于利弊相衡的中性词,就好比我们在说英国淑女和绅士给人的高雅华贵的同时,也隐隐觉得英国人高雅而近于冷漠,华贵而难以亲近。可见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进行划分。那么当我们试着带着辩证的眼光看待有"文化熔炉"之称的美国时,我们更是不停地挠头,因为这个富庶的国家却喜欢穿牛仔裤,运动大国却满街的"肥胖人士",科技尖端而学生却貌似数学很差。你说种族歧视吧,却明明一个黑人在当总统。也许这些杂糅和混合如同膳食结构合理的一日三餐,让这个建国百年的"年轻"小伙子茁壮成长。

纵览欧洲,我们可以一睹思想理论创建的发展沿革;回看美国,却是实实在在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英国的判例法、法国的三权分立、德国的现代大学制度。美国现在取得的成绩恐怕那些大西洋彼岸的"老师们"都不得不折服。也许是这个单纯而又复杂的民族有一种独特的张力:舒张与聚合并存。像阳光下的肥皂泡,鼓鼓得而闪烁着光彩。"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这些价值观念虽然吸引眼球,但其实有其内在的矛盾性:比如效率和公平,自由与规则,既想有活力与张力,却又能保持和谐与凝聚,美国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管中窥豹地探讨一下这个奇妙方程的合理解答。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L.B. Sullivan)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尤其是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陈词中"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uninhibited)、充满活力(robust)并广泛公开(wide-open),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

一、舒张:政府与媒体的互动与制衡

1. 言论自由的尺度

自由有尺度吗?言论自由的尺度是什么?散发反战传单,是否危及前线将士安危?("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1919年])当众焚烧国旗,有没有褻渎人民对国旗的神圣情感?("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年])州法官候选人在竞选中宣扬自己的司法立场,是否违反了司法伦理?("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诉怀特案",[2002年])往黑人家里投掷燃烧的十字架,是不是散布"仇恨言论"?("弗吉尼亚州诉布莱克案"[2003年])

禁止节目嘉宾说粗口,是否侵犯言论自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诉福克斯电视台案"[2009年])……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地标定言论自由的尺度,试图通过一系列判例,在宪法条文、社会现实与价值变迁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这其中,"《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英国哲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认为,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意见争执冲突,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论出版自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提出,一种言论如果有害,就需要更多的言论来校正、稀释、中和,而非厉行禁止,令万马齐喑。《论自由》)

2. 南北方冲突:《纽约时报》阿拉巴马

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甚至受到州法律的认可与保护,黑人由生至死都被打入社会底层。最近一则美国密苏里州的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也持续发酵,并逐渐酝酿成民众反而政府强权的骚乱。过去,黑人小孩只能在教学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就读,黑人不能进入绝大多数旅馆、餐厅,不能与白人同坐公交车。如有违反,会立即被警察逮捕。大多数南方地区的黑人还被剥夺了投票权。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措施违宪之后,种族歧视现象有所缓解,但仍然受到南方各州的抵制。而推动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这则广告刊出之前,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刚刚展开;北卡罗来纳州的四名黑人大学生在当地一家餐厅用餐遭到拒绝,他们就地静坐,抗议这一歧视行为。很快,声援他们的抗议活动在整个南方地区蔓延开来。

3. 冲突域与消解

这则不经意的广告触发了一场法律与政治的冲突。这场冲突不仅威胁到《纽约时报》的生存,也危及媒体报道重大社会议题的自由,乃至公众的知情权。四年后,靠美国最高法院的转折性判决力挽狂澜,所有威胁才烟消云散。过去,最高法院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已确立一系列涉及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准则。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最高法院不仅重申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也让人民了解到,他们有权对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使1791年发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那寥

● 主题书评 ●

寥几个单词,焕发出新的活力:

"国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S...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THE PRESS.)

峰回路转,最高法院捍卫尊严。抛开各州存见和短期效益,而更着眼于长期的司法尊严和自由氛围

4. 媒体的反思

《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刘易斯 (Anthony Lewis)指出,现代媒体的权力、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新闻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自己发布的不是新闻,而是真理,如此一来,媒体的所作所为,反会招致公众反感。刘易斯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无羁地讨论公共事务,而非只为媒体一家服务。所以,言论自由并不是由媒体一家独享,而是取决于广大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否则,就会像罗伯特·博克法官(Robert Bork)所警告的:"媒体独享某种自由到什么地步,这种自由所受的威胁,就达到什么程度。"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也多次强调:"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参见温家宝前总理2011年3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

二、 聚合:自由与法制抗争与和解

1. 费城角力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讨论美国宪法草案时,还没有今天所谓"宪法权利"之说。诸如宗教自由、正当程序之类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人权保障条款,宪法也全未涉及。其实,这部宪法只是一份框架性文件,目的是为促成彼此独立的北美十三州,能够统一在新联邦政府麾下。当时,十三州各自为政,冲突不断。州际贸易税目繁多,叠床架屋。各州均有货币流通,全国没有统一币制,更无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与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Jr.)筚路蓝缕,筹备召开制宪会议。然而,直到最后一刻,华盛顿将军才决定赴会。即便如此,会议临召开前,组织者们对能否凑足代表参会,内心仍全无底气。为统一意见,代表们就如何组建中央政府,拟定了共同章程。但是,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持有疑虑,也即对绝对权力的畏惧。当年,他们为反抗英王,发起革命,争得独立,自然不希望任何极权政制借助伪装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期盼拥有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中央政府。

2. 对联邦政府说"不"

制宪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

高度自治的共和国。人民有权通过法案,选举领导人,也有权更换执政者。但是,大家并没有想出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确保政府权力不被滥用。后来,会议采纳了麦迪逊提出的所谓"辅助性预防措施",即分权制约策略。首先,各州保有主权,联邦政府仅享有特定权限,如管理外交事务、处理州际贸易。其次,联邦政府分为三个独立分支:立法、行政与司法。某一支权力过分扩张时,另两个分支可施以反制,这种彼此制衡的权力设计,足以防止出现独裁政治。制宪先贤深信,三权分立能够防范暴政,从对权力架构的设想而言,他们当然有理由骄傲,然而,这些人却低估了当时的社情民意。宪法草案交付十三州审议批准时,遭遇社会各界强烈抵制。一些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如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和乔治·梅森(George Mason),都反对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认为这样难免导致专制。反对呼声最强烈的三个州分别是马萨诸塞、纽约和弗吉尼亚。最后,还是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汉考克想出一个制衡联邦权力的折中之计。他提出,各州在批准宪法的同时,第一届国会必须增补部分宪法条款,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

第一届国会顺应各州呼声,增列了十条宪法修正案,并于1791年获得通过,这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国会不得立法以: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

3. "言论自由"面面观

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表达自由条款究竟是何含义?从字面上看,这些文字貌似简洁,实则包罗万象。既然它说"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是否可以更加直白地理解为,美国人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决定言说、出版的内容,而无须顾忌法律惩罚呢?当然,这样的情景,从未成为现实。果真如此,写勒索信就不会入罪,因为勒索者的行为只是说说写写。此外,循此逻辑,在法庭作伪证,当然也不会被判有罪。

1859年,穆勒的《论自由》出版后,言论自由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在这本书中,穆勒列举了言论自由的可贵之处:首先,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其次,就算那些噤声之语存在谬误,但也可能,而且通常是,包含部分真理。任何普遍意见,又或主流观点,都不可能囊括全部真理,只有让各种观点彼此辩驳印证,真理才会越辩越明。第三,就算我们相信眼前的意见是真理,若不容它接受对立意见的挑战和检验,人们对待这一意见的态度,将如同保留偏见,对它的理性依据将缺少领会与感知。

4. 异议者的存在:谁给你们勇气?

在关于政治话题的激烈争论过程中,难免会有人情绪激动,甚至有过激之举,大家唇枪舌剑,激烈攻辩,多基于各自有限认知,这些认知当时或许被笃信不疑,事

后却可能被证明是断章取义、错谬曲解。有时,往往是那些合理却又无法证明的怀疑,又或未经确认的'内部消息',暴露出官员的无能、过失或恶行……如果用诽谤诉讼威胁那些因真诚/相信错误事实而批评官员者,或者要求批评官员的出版物必须证明自己提到的每一处细节都绝对真实,必将扼杀所有对政府或官员的批评。——《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同样认为,言论自由应容忍错误存在,甚至是一些严重错误。判决提出,仅仅保护实事求是的陈述是不够的,因为人们有时会因害怕犯错,而不敢对政府提出批评。因此,为了防止人们自我审查,必须允许他们存在"犯错的空间"。最高法院的上述立场,对美国报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数十年中,新闻界在"美莱村屠杀案"、"五角大楼文件案"等事件中大显身手,揭开政府一系列决策内幕,并在"水门事件"中迫使总统尼克松下台。在这些事件中,最高法院都援引"沙利文案",对新闻界给予宪法支持。可以说,"沙利文案"改写了美国新闻史。

容许新闻报道存在犯错空间,对新闻界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就是那些并非"绝对真实"的匿名消息源,如果按照"沙利文案"一审判决的界定,批评官员的言论必须证明自己提到的每一处细节绝对真实,那这些报道就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

5. "沉寂效应"

民主以自由为基,但滥用自由同样会侵害民主自身。滥用言论自由对民主社会的最大威胁便是产生"沉寂效应"。"沉寂效应"是指一种言论的表达导致遏制其他言论表达的效果。民主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便是能够听到尽可能多的声音,而"沉寂效应"无疑损害了民主的价值。布伦南大法官(Justice 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不赞成绝对的言论自由便是基于对民主的保护,他说"与今时今日一样,第一修正案诞生时,总有人肆无忌惮,费尽心机,散布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的言论,将之作为排除异己,甚至颠覆政权的有效政治工具……这些被作为政治工具的言论,并非自始即受宪法保护。如果蓄意造假的谎言在政界通行无阻,无疑会伤害民主政府的前提,也违反了以正当手段推动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原则。"

三、 当街起舞的时刻

任何一种民主政体,若无畅通资讯,或获取资讯之途径,只会沦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知识将永远统治愚昧:人民若当家做主,必须用知识的力量武装自己。

——詹姆斯·麦迪逊,1822年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

度。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美国是判例法的国家,最高法院确立的原则是以后类似案件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宪法原则。它认为,"对公开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人民才是宪法的主人,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论,都享有免责权"。如果没有"《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媒体未必敢像今天这样,竭尽全

老师点评:

初看此文题目:《舒张与聚合:美国社会民族性一瞥》,便有些不知所以然。《批评官员的尺度》和"美国社会民族性"有何关系?读下去,发现作者理解《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的视角,也是"独特"。从这本有关叙述美国言论自由历史事件的书里,作者读出了"美国社会民族性"的问题,并把"美国社会民族性"界定为"舒张"和"聚合"。到底什么是"舒张",什么又是"聚合",作者却不给解释,这让我也是"不停地挠头"。

后面作者围绕着"舒张"与"聚合"展开了他的文章,但并未解释,为何"政府与媒体的互动与制衡"便是"舒张","自由与法制抗争与和解"便是"聚合"。除了大小标题和前面几段文字,在文中和结论部分,就再也找不到作者如何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读出的"美国社会民族性",以及"舒张"、"聚合"的有关内容了。

阅读中,接下来知道他在写《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的关键问题了,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尺度在哪里,并点出了这本书的真正关键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推动美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从后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是比较熟悉的,对言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理解的。初读此文,感觉作者很有些赵一凡先生(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行文的味道,浅易平和,娓娓道来。或许作者对"美国文化批评"比较擅长,看到了"美国社会民族性"的问题,但只可惜《批评官员的尺度》并不是谈美国民族性的

赵骏

● 访谈实录 ●

贯通文脉、学脉与人脉

——美国佐治亚大学 Jace Weaver 教授访谈实录



编者按:此次海外教授访谈博士沙龙《言思录》委托我校在美国访学的博士生徐谔律同学与美国佐治亚大学 Jace Weaver 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韦弗教授是目前美国印第安研究领域最著名、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他拥有法学、宗教学学习背景,而研究成果与教学内容涵盖领域广泛,以文学、政治、生态学研究最为突出,体现出他的跨学科研究视阈与学科融通综合能力。采访者就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和方法与韦弗教授深入交流,也请教授谈到他的治学经历与海外教学感受。

采访对象:

杰斯·韦弗教授 (Dr. Jace Weaver, 1957-), 美国佐治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宗教系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主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 (J.D.)、宗教学博士 (Ph.D. in Religion), 美国本土与原住民研究协会 (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 创始人, 美国宗教学研究学会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会 (Association of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理事,《美国印第安文化与研究》(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美国印第安研究季刊》(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加拿大原住民研究》(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American Studies)、《美国宗教学研究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等刊物编委, 先后在耶鲁大学、佐治亚大学等大学担任美国研究、宗教与法学教授, 重要学术著作有《民族将继续生存——美国印第安文学与美国印第安社群》(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 1997)、《他者的话语——美国印第安文学、法律与文化》(Other Words: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Law and Culture, 2001)、《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民族主义》(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Nationalism, 2005)、《红种人的大西洋——美国土著人与跨洋文化交流:1000 - 1927》(The Red Atlantic: American Indigenes and Transoceanic Cultural Exchange, 1000-1927, 2014) 等。

采编:徐谔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美国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美国佐治亚大学印第安研究中心 2013-2014 学年访学博士生。

打通学科门户, 另辟研究蹊径

Q: Dr. Weaver, you've long been a leader in arguing for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your own work o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as well as academic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is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focusing interwovenly and interchangeably on law,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which reminds me of a Chinese saying concerning humanity studies, roughly translated a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tudies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tegrated unit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issue?

Q: 韦弗教授, 长期以来, 您都在呼吁将美国印第安研究设为独立的学科, 而我注意到, 您在美国印第安研究领域的成果、学术背景和教学经历都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特征, 将法律、宗教与文学研究综合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中国人在描述人文科学研究的特点时常说的一句话——“文史哲不分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A: I've not heard of your saying in China, but that's certainly true in my work. Philosophy Department and Religion Department are often intermixed. I use that certainly in my new book *The Red Atlantic* with a lot of history, and literary studies, plus, in my case, law. I've also written quite a lot about religion. My work integrates all four of those.

A: 虽然我没听过, 但我十分认同中国人的说法。就我的研究而言, 事实的确如此。比如说, 佐治亚大学的哲学系与宗教系就设在一起, 工作与研究时常有交集。当然, 在我最新出版的论著《红种人的大西洋——美国土著人与跨洋文化交流:1000 - 1927》中, 我也将大量的历史、文学以及法律研究糅合在一起。我也做过许多关于宗教的研究。我的工作综合了上述四个学科。

Q: But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re are distinct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do not always appear to be interwoven, or closely-connected. Could you please let us know how do you manage to straddle between them in your work?

Q: 但不同学科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有时并不能交错使用, 之间的联系也不太紧密。您可否谈一谈您是如何驾驭这些不同的学科, 将它们如此娴熟地综合对接呢?

A: Well, I think Native American study is by nature interdisciplinary. In that way, it's a lot like religious study, because in religion, no one would deny that religion is a discipline. But unlike history, where the stress is first on the archive - the research of archives is its methodology; or anthropology where fieldwork is the way, or whatever, in religious study you have theology, philosophy of religion, you hav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you have religion in literature -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ways of going about studying religion. And that was background I came out of in my masters and Ph.D. work. Plus, the law and religious studies, and literary studies are all about the close-reading of texts. In the law it is reading the case, in religion it's about scriptural texts, and in literary studies it's about the close reading of texts. This is the basis on which I conduct m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 在我看来, “跨学科性”是美国印第安研究的本质特征。就此而言, 美国印第安研究与宗教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宗教研究领域, 人们不会否认宗教是一门学科。但宗教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又有所区别。历史学的方法是搜集与研究史料, 人类学是通过田野调查进行研究, 等等; 而宗教研究包含了神学、宗教哲学、宗教人类学、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等, 这些都是进行宗教研究的不同途径与方法。这构成了我硕博研究阶段的学术训练背景。此外, 法律与宗教研究, 以及文学研究有一个共性——文本细读; 法律研究需要细读案例和法律条款, 宗教研究需要细读圣经等宗教典籍, 文学研究就更是细读作品文本了。这个共性便是我得以在这些领域之间建

立联系、展开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Q: Nowadays, the majors and fields in the universities are more and more elaborately divided. There are "boarders" and "walls" between disciplines. Is it contradictory to your advocac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Q: 如今, 在大学里, 各种专业领域的分类越来越细, 在不同学科间筑起“边线”和“围墙”。这似乎与您所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是矛盾的?

A: Oh, I think they are opposite in some ways, and I am not one of those big fans of rigorously putting up walls between disciplines. I think that leads to more and more knowledge about less and less. As to myself, I do advocate and prefer to integrate, rather than separate the disciplines elaborately.

A: 是的, 我觉得它们在一些情况下是对立的。我不太主张在不同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壁垒与界线。我觉得那会导致领域越来越窄, 而每个领域要求掌握的知识又会越来越多。我自己更主张、倾向不同学科的综合运用, 而不是将其精细区分。

Q: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ost desirable and indispensable qualifications for do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Q: 那么您认为在做跨学科综合研究时, 研究者最需要具备什么品质呢?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能力呢?

A: I think that you, first of all, have to be willing. You cannot be trained in all the different disciplines. But you need to at least be somewhat conversant with how other disciplines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So we teach graduate students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historians do, what anthropologists do, and what archeologists do, etc.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lenses. If we're going to have conversation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we have to have a common foundation on which we discuss them, or from which we discuss them.

A: 我认为首先必须具有主动性。接受所有学科的学术训练是不现实的, 但跨学科研究者至少需要熟谙其他学科的门道、套路。所以我们在课堂上, 会让研究生了解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与方法。这些都是不同的研究途径、不同的切入点。如果要在不同学科间 viser think of your dissertation on literary study?

Q: 那么, 您的意思是不是沃瑞尔教授直接影响了您的博士论文选题, 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途径去反观宗教呢? 您的宗教学博导当时赞成您的博士论文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吗?

A: I would agree that Robert Warrior inspired me greatly. I was looking at what

● 访谈实录 ●

展开对话,我们应当找到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或者是共同的讨论出发点。

结交专业伙伴,树立学术自信

Q: When did you start to go about i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And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as your specialty?

Q: 您是何时开始做美国印第安研究的呢?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作为研究兴趣?

A: After I got my J.D. degree from Columbia, I became a lawyer in New York and had worked in law firms for eight years. Then in 1990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go back to graduate school and deal with Native American issues. My Ph. D. is actually in religious study.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with Robert Warrior, and he was also getting Ph.D., doing his dissertation on Vine Deloria, Jr. and an Osage writer named John Joseph Matthews. Warrior ended up getting his first job in English Department at Stanford. I thought that was a fairly good model, so I kind of decided to go to do literature out as well. And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communitism" – Native writers are proactively involved in Native community, which was the subject of my dissertation. And it became later the book *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做了八年的律师。1990年,我决定再次返回学校攻读宗教学博士,从事美国印第安研究。当时,罗伯特·沃瑞尔(现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英语系、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著名学者——编者注)是与我同级的博士同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印第安作家、历史学家怀安·德罗利亚与奥塞奇印第安部落作家约翰·约瑟夫·马修斯的研究,沃瑞尔毕业后最初去了斯坦福大学英语系。我受沃瑞尔的影响和启发,认为他的做法非常值得学习,所以我也决定从文学切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我提出了"社群主义"的观点,因为美国印第安作家是印第安社群中的活跃分子,在他们的写作中也强烈地反映社群主义思想,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专著《民族将继续生存——美国印第安文学与美国印第安社群》(本书是韦弗教授影响力最大的著作,公认的美国印第安文学与美国印第安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读书目——编者注)。

Q: So, are you saying that Prof. Warrior was the direct factor that prompted you to do your religious studies with lens and focus on literature? And what did your religious adhe was doing and then dwelt upon it. Then Craig Womack dwelt again upon it with *Red on Red: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Sepa-*



ratism, and of course we three wrote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Nationalism* together. When I was writing my dissertation, although the proposal was approved, my adviser was not particularly happy with it. He did not think it focused upon religion. But he said he was to let me defend it,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I would pass the defense. And by then I already had the book under contract a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 he let it go through.

A: 是的,沃瑞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当时正是学着他的样展开文学领域的研究的。后来,克莱格·沃玛克(现为美国埃默里大学英语系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著名学者——编者注)也走了这条路,写了《红种人笔下的红种人: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分离主义》(1999),而且后来我们三人合著了《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民族主义》(此书也确立了韦弗、沃瑞尔和沃玛克教授在美国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三人也常被成为该领域里的"3W"——编者注)。说实话,我的博士论文虽然开题计划是通过了,但我的导师并不是那么满意,因为他觉得我的论文没将宗教作为研究重点。不过他还是让我参加论文答辩,因为他知道我能够通过。到我答辩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谈妥出版合同,所以他最后还是同意我答辩毕业。

Q: With two doctoral degrees, what do you think you have benefited most from such educational experience?

Q: 前面也提到,您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那么在这两段教育经历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A: One thing I think the law taught me that has served me well in my second study of MA and Ph.D. was how to write fairly well and how to write fairly quickly, because you have to do that in the law, and also how to research fairly quickly and fairly well.

A: 我觉得法学博士的学习对于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有很大的帮助。我能够高效、高质量地写作,这是法学专业给我的良好训练;另外,通过法学专业,我掌握了高效、高质量地进行资料搜索与研究的能力。

利用外部资源,努力坚持前进

Q: You have been to China, taught and

gave lectures in several universities with different special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have hosted three Chinese Ph.D. candidates here at UGA. According to your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could you please talk about your impressions and feelings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 我知道,您去过中国,也在好几个中国大学里教过书、做过讲座;您也在佐治亚大学的印第安研究中心接收并联合培养了三位中国访学博士生。那么,在与中国学生、中国大学的接触经历中,您对中国的研究生和大学教育有什么印象和感受呢?

A: As I understand it, the Ph.D. as required credential is fairly new in China. Before, if you were master, you can teach in the university. But they are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ing the system more. And I think it's good. We've been very lucky to have three very good Ph.D. students coming from China to work with us here. They come here because of the library, the research resources here which they wouldn't have easy access to in China. So I think it's a good system. And they come, it seems to me, having talked with the masters often, with a kind of maturity that some American graduate students might not have. As to my teaching experience in China,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taught three times in China, and I lectured in a number of other places over the years. But I taught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nd Xiamen University, and I enjoyed it. Chinese students are bright, and eager. They are grateful to head scholars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each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have some interests in China. For the three times I taught there, I taught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but I lectured on literature, and my wife Laura Adams Weaver lectured on literature.

A: 据我所知,博士学位作为中国大学教职的准入条件是相对较新的要求。几年前,有了硕士学位就基本可以在大学教书。但现在的要求也是中国大学教育走向专业化的必经之路。我觉得这样的要求是有必要的。我们的研究中心很荣幸,到目前为止先后接收了三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博士生前来与我们一同工作学习。她们在我们学校利用图书馆与教学研究的资源

开展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在中国很难获得。所以,我认为现在这种海外联合培养、访学交流的制度非常难得,对中国博士生的学业很有帮助。通过她们与我们的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我注意到,她们对本学科的认识与思考比有些美国的研究生要成熟许多。我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教过美国文化、美国宪法等课程,也与我的妻子劳拉·韦弗(Laura Adams Weaver, 佐治亚大学英语系、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心副教授——编者注)在许多其他中国高校做过关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的讲座。在中国的教学、讲座经历让我十分难忘,中国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非常聪明、好学、努力,对外教、外籍专家(尤其是像我这样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的老师)很客气礼貌。

Q: Could you please send some words to the readers of our journal, the M.A. students and Ph.D. students mostly doing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in China?

Q: 最后,您可否送给《言思录》的硕博士生读者们几句寄语呢?

A: Keep going. When you write your dissertation, there would come a moment every graduate student I've ever talked to have been the case: when you feel as if you are not saying anything, or you don't know why you are writing this. Just keep writing, and you will break through that wall and will produce something wonderful.

A: 我的寄语是: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写作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每一位研究生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你会觉得你似乎什么也没表达清楚,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写作的初衷是什么;但千万不要停止,要坚持写下去,你们定能走出困境、突破藩篱,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结语:"文无定法,文必有法,贵在得法",打通学科门户对人文社科研究的创新十分重要。正如韦弗教授在宗教、法律与文学研究中找到"文本细读"的共同研究出发点,在人文社科领域(甚至扩展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中找到某个共同的研究基础,这是开展跨学科对话的联结点,也是"得法"的充分条件。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既可作为研究透视的棱镜,又可作为研究的聚焦点。当然,韦弗教授也强调,必须具有主动学习的能力、熟悉所涉及领域的门道,这是展开跨学科研究的前提。韦弗教授向我们真切地讲述了论文的构思与写作对每位研究生而言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研究生们应当珍视自己每一个思路想法、树立学术自信,而找到研究兴趣相似的学术伙伴或学术榜样则是研究生学习的助推剂。韦弗教授用求学、研究、教学的切身经历告诉与勉励我们,灵感与火花常常来自思想的碰撞,闪亮的成果往往都有千锤百炼的过去,而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不懈地前进。

● 访谈实录 ●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琦老师访谈实录



编者按:此次访谈博士沙龙《言思路》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青年教师陈琦老师。陈琦老师具备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维学院英国文学的综合学术背景,研究领域涉及中英文学关系、中英文化关系、英国社会思潮、英国文化政策等。在采访中,陈琦老师与我们简单分享了他一路走来的学术研究历程,同时根据其个人经历,对跨学科研究这一话题,阐述了他的研究体会。

采访对象:

陈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2000年9月至2004年6月,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获"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2004年9月,直升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为中外文学关系)。2007年9月,获英方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英国政府海外优秀留学生奖学金和Thomas Holloway奖学金),赴伦敦大学皇家霍洛维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攻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于2011年12月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博士期间获伦敦大学托马斯霍洛威和英国政府ORS奖学金,英国维多利亚学会会员。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兼职)、上外图书馆英美文学特聘学科馆员、上海市晨光学者、上海市浦江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下属英国研究分会会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员、上海欧洲学会会员、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员。

Q:陈琦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就读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中外文关系方向,而博士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维学院英语系,请问是怎样的力量或者机缘使得您在本硕博期间选择这样三个专业方向?

A:本硕博选择三个不同的专业方向,回想起来,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有这么一个明确长远的规划,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选择就读复旦大学是因为我喜欢复旦的人文氛围和红色的砖墙教室,选择中文系是因为我不想高中一毕业就立刻去学一门"手艺"。我喜欢"大文科",也就是说,我喜欢看杂书,哲学、宗教、文学、语言、文化、历史、社会、心理什么的,只要有趣,都喜欢看。说句玩笑话,如果一个老师想毁掉一本好书,那就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拿这本书划考试范围,如果一个学生想毁掉对一部作品的热爱,那就拿它做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复旦的人文学院包括中文、外文、哲学、历史、文博、宗教,正是这种"大文科"的课程设置,让我觉得不错。在"大文科"的阅读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不同文科学科之间,存在深厚的共同的基础,而现有的学

科分类设置,人为地把各人文学科强行割裂,变得支离破碎。所以在硕士阶段选专业的时候,我就选了贾植芳先生创立的、同时拥有中文系和外文系背景的复旦比较文学专业。比较文学对中外文学、文化的要求都非常高,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必要到国外开拓下眼界,加强一下对外国文学文化的理解,于是申请了伦敦大学下属的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英文系,攻读英文博士。

Q:上面说到您的学术背景,而翻开您的履历,可以看到您现在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中英文学关系、中英文化关系、英国社会思潮、英国文化政策等,内容包括您之前所学的比较文学、以及英国文化、政策等内容,有关文化、政策的研究是从您博士时期开始的吗?您在本硕期间的学术背景偏向于文学,而目前我们看到您的研究重点可能更偏向于英国文化研究,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您的研究领域、重点经历过哪些变化或叠加?这些学科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A: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拿复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来说,不仅有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文学"课程,也有哲学导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宗教学、美学、世界文明史、欧美文学史等"大文科"课程;拿我的博士论文来说,《帝国与民族国家:英国唯美主义与东亚文化》既是文学研究也是文化研究。无论是在复旦还是在伦敦,对我而言文学与文化从来没有割裂过。文化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毋庸多言;文学作品,特别是凝聚了时代精神的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研究脱离了文学经典而一味地去研究"亚文化",我也不赞成。文化研究不仅不应排斥文学文本,而且应给予(经典)文学文本以足够的重视与尊重。

Q:我们知道您目前在英国研究中心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而作为拥有汉语言文学、比较文学和英语学习背景的学者,您对于英国文化、政治问题一定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能够简单介绍您为何选择加入英国研究中心,您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重点以及您的研究视角吗?

A:我是英语学院的教师,同时在英国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做一些研究工作。我平时工作的重心还是英语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帮助建设英国研究中心,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英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与我自己的科研兴趣有重合之处;其次,知识无国界、学者有祖国,英国研究中心以"区域研究"为重点,侧重政策咨询,可以直接服务国家利益;再次,英国研究中心与英语学院关系非常密切,我作为英语学院的一员,服务于英国研究中心也是分内职责。英国研究中心内部对于具体的研究方向各有分工,我平时主要是关注英国文化政策、社会文化现象。

Q:跨学科可以说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和教学的一大特色,请问您能否结合自身经历谈一谈您对跨学科研究的看法?您是如何做到兼顾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呢?

A:我支持学校的跨学科教育以及平时对研究生们跨学科意识的培养。学科的分化和重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学科分化是由于知识量不断增加,而人类这一物种生命过于有限,从而使得学者不得不专攻其一。学科分化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学科之间的壁垒越来越高、鸿沟越来越深。但就人文学科而言,以我的经验,所谓壁垒和鸿沟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许由于其专门性不得不接受那样的学科分界,但人文学科,你能说弥尔顿的《失乐园》与基督教是截然分开的吗?莎士比亚戏剧与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是可以割裂的吗?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不存在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吗?解读《印度之行》可以忽略其中的南亚次大陆宗教文化以及历史背景吗?所以,跨学科研究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只不过是有时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Q:同时,在您看来,跨学科教学对于学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怎样才能在学习中做到兼收并蓄,例如在上外,如何在学好语言的同时,掌握好另一门语言或专业?

A:我以为,"跨学科"是自然而然,每门专业课都各有自己的学科属性,每门课程的学习都是分门别类的专业学习,然而,通过各门课程的学习,会无意识地就拥有了"跨学科"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是潜移默化的。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学习,从已有的

知识推及未知的知识,触类旁通,豁然开朗。

Q:您觉得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A:首先是扎实的专业学习,比如要从事中英比较文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的知识不应低于专业要求,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其次是广泛的阅读,兼收并蓄,包容开放,欣赏一切有趣的、有创意的想法;再次是拥有善于发现问题的学术嗅觉,能够找出真正的问题,能够敏锐地察觉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做一位跨学科的研究者,也许一开始我们会计算,采用什么什么学科的视角了,采用什么什么理论了,跨了多少多少学科了,但是到了后来,也许我们就会懒得去计算,抑或忘却了学科的边界,跨学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

Q:最后,您能否为《言思路》的硕博士读者们赠几句话?

A:"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结语:诚如陈琦老师所述,学科间的鸿沟与壁垒并非不可逾越,跨学科研究,是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扎实基础、广泛阅读、触类旁通,便能自然而然地将跨学科视域融入到研究中。万变不离其宗,任何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具备良好的学术功底和知识储备,方能做好学问。

● 资讯长廊 ●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推荐书目选摘

马丁·瓦尔泽

《进涌的流泉》,卫茂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第 103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魏育青推荐

小说以德国博登湖畔一小城为背景,叙述了主人公约翰从六岁到十八岁的经历,反应了 1932 年至 1945 年德国那段最黑暗、最野蛮的历史。作者曾连续几年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主人公约翰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在母亲开的餐厅里帮忙打杂,还为村民运送煤炭,但仍改变不了家道的拮据。生意惨淡,市场萧条,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恐惧。为了生存,洁身自好的母亲只好加入纳粹党。父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成天做着一些不着边际的梦,为摆脱困境,建立饲养场,喂养银狐,还和朋友合伙生产治病的磁疗器,失败和无能使他愧对家人,最后英年早逝。约翰渐渐长大,爱上了马戏团的小演员阿尼塔,同姑娘的肌肤之亲使他在心理和生理上成熟起来,在一次纳粹分子暗袭马戏团时,他勇敢地站在了被袭者的一边,为此同好友阿道夫决裂也在所不辞。为了去异地看望心仪的姑娘,约翰逃学逃夜,甚至置母亲的担忧而不顾。战火越演越烈,小镇不再有往昔的宁静,到处是心灵破碎的难民。约翰被迫放弃当歌唱家和诗人的愿望,入伍投身到纷飞的战火中,经过短暂的俘虏生活回到家乡和亲人重逢,而哥哥却战死在疆场。事过境迁,阿尼塔另有所爱;约翰终于找到了生活伴侣莱娜。令人迷醉的爱情生活使他跨入了成熟的又一阶段。

陈众议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第 126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张和龙推荐

"学术史研究"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元研究"。北大的陈平原先生称学术史研究为"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正如陈众议先生在该书绪言中所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塞万提斯是一位经典作家,有关其

作品的研究浩如烟海,因此,想要进行塞万提斯学术史的全面研究, 实非易事。而本书撷取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角便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堂吉珂德》研究,再由点及线、由线及面,最终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塞万提斯研究的全局图。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是我国第一次系统地进行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塞万提斯及其《堂吉珂德》的学术史梳理,相对客观地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地全面梳理;第二部分为"研究之研究",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审视经典,诠释经典;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去粗存精, 罗列出塞万提斯研究的重要文献目录,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本书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在四百多年来浩如烟海的塞万提斯研究史料中归纳提炼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 分析比较了中外研究人员在立场、观点、思路、方法、历史文化语境、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异同,特别是总结了 中国学者研究的特点、成果和规律,利用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并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堪称代表了当今中国塞万提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最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

梁启超

《德育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第 134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姚大力推荐

本书是梁启超编著的青年德育教本,全书以"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有"为目,分为六篇,每篇之前有梁启超所做简单说明,内收梁启超精心选录的先贤大儒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说,之下有梁进一步发挥的按语。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引领时代风气的人物,此书初刊于 190 5 年《新民丛报》,民国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现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重加标点整理和注释,刘东教授作序导读,以方便读者阅读的新形式重新出版,作为"清华大学学院德育读本"之一种。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谓妇孺皆知。不少人也耳熟能详,上述校训辑自《周易》上的乾、坤二卦,其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会有不少人已有了解,清华立下这个校

训的契机,缘于梁启超 1914 年来校的一场讲演。甚至,如能再多读几本梁先生的书,还会知道他常爱以代表天、地的这两种物象,来表达自己对高尚人格的摹状。不过,如果再跟着追问一步:这种足以"载物"的"厚德",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德性"?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君子风格,又属于何种伦理范畴?再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向称" 礼义之邦"的文化共同体,其最能代表文明高度的所谓"礼义",又是凝聚和涵容了怎样的价值?对于后边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在梁启超那次讲演的十年前,就已被他编写到《德育鉴》里面了。中国文化既是有丰富面向的、又是有诸多层次的,可唯有谈论道德修养的话语,才堪称其正宗与主流。因此这本书虽说篇幅不大,却有相当厚重的文化容量;也唯有本书中这类道德学说,才构成了从前那个社会的底色,展示了过往文明进程的厚度, 构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核, 铺垫了古代生活世界的

布鲁诺·G.巴拉

《认知语用学:交际的心智过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第 138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周昌乐推荐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交际本质上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合作性活动,互动的意义由所有参与其中并关注彼此语言的行动者共同构建。在互动中,行动者的目标会有所不同,但要保证交际的成功,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共享一组共同的心智状态。交际成功与否的责任落在所有参与者的肩上,需要他们保持行动的协调。如果墨守成规地单纯研究发话者和听话者,或只研究发出方和接收方,就会让完整的交际活动变得支离破碎,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书中所谈论的是交际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输,因此,主体必须有意向地参与共同的交际活动。交际的意向是有意识的意向,交际中不存在无意识的意向。同时,本书也强调了认知这一概念,研究从交际参与者个人的认知出发,试图解释每个交际行为生成的认知机制(即在变成物理信号之前),以及其他谈话者理解的认知机制。

研究是目的在于描述交际互动过程中参与者们的心智状态。除了分析和描述以外,作者还对各种心智状态进行正式定义,比如信念和意向等概念。以这些心智状态为基础,作者构建了一个逻辑模型,解释交际行为的动态生成和理解机制。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

最新学术成果目录选摘

张和龙

张和龙. 英国现代戏剧在中国的研究:百年史述[J]. 戏剧艺术, 2014, (2): 41–48

张和龙, 李翼. 中国司各特研究的百年流变[J]. 外语研究, 2014, (1): 100–106

张和龙. "9·11 文学":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J]. 深圳大学学报, 2014, 31(2): 20–25

张和龙. 学术史视角下的" 现代主义" 再审视——读盛宁先生的《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J]. 外文研究, 2014, 2(1): 55–61

陈嘉映

陈嘉映. 伦理学有什么用?[J]. 世界哲学, 2014, (5): 145–151

陈嘉映. 善"不与恶做对"[J]. 哲学分析, 2014, 5(5): 77–84

陈嘉映. 实践/操劳与理论[J]. 同济大学学报, 2014, 25(1): 15–23

陈嘉映. 言意新辨[J]. 外国哲学, 2013, 12(6): 3–23

朱永生

朱永生. 汉语词汇化中的词汇语法互补性[J]. 中国外语, 2014, 11(2): 39–45

朱永生. 系统功能语法与古汉语关系过程小句[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13, 35(2): 117–121

朱永生. 系统功能语言学个体化研究的动因及哲学指导思想[J]. 现代外语, 2012, 35(4): 331–337

朱永生. 适用语言学: 定义、基本特征、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势[J]. 外语学刊, 2012, (4): 34–40